历史的正义与文明的抉择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从什么角度书写历史、以何种史观烛照来路，决定着我们能迈向何等辽远的未来。十四载浴血奋战，“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中华儿女不屈不挠、同仇敌忾，以“誓与山河共存亡”的如磐之志、“愿拼热血卫吾华”的铮铮气节、“一寸河山一寸血”的巨大牺牲，谱写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伟大篇章。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是神圣的、进步的、追求和平的正义战争，是挽救中华民族命运、守护世界和平安全、捍卫人类文明成果的伟大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既是为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战，也是为世界和平与正义而战，更是为人类生命与尊严而战。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昭示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伟大真理，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渡尽劫波的古老中国，自此踏上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以史为鉴，方知兴替。硝烟散尽八十载，在一片片曾化作焦土的大地上，和平的颂歌久久回响，诠释着世界人民对和平的无限珍视。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但动荡与冲突的阴霾远未消散，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团结还是分裂、对话还是对抗、共赢还是零和的十字路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国际形势越是变乱交织，我们越要坚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持续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抗日战争的历史，不仅是战争史，更是精神史、心灵史。穿过历史烟云，一个结论掷地有声、发人深省：“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大道不孤，众行致远。全世界爱好和平、维护正义的力量团结起来、携手共进，坚定做历史记忆的守护者、发展振兴的同行者、国际公平正义的捍卫者，就一定能战胜风险挑战、跨越艰难险阻，为人类前途命运争取更加光明的未来。

——《学术前沿》编者

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再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朱佳木

【摘要】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到来之际，有必要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进行再认识，纠正在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宣传中出现的偏颇，进一步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这一作用主要体现在：最早发出抗日号召并进行武装抵抗、率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推动国共合作、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壮大抗日武装并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正确处理国共矛盾、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并在全国起到示范作用、涌现英雄人物并凝练出抗战精神等八个方面。正确认识和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中国人民抗战史和中共党史，有助于广大群众在新时代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奋斗。

【关键词】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　中流砥柱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4.001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牵制和消灭日军最多、付出民族牺牲最大的战争，也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赢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重大转折点。它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推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它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

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主要著作有《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论陈云》《再论陈云》《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当代史》《改革开放与中国当代史》《新时代与中国当代史》《论中国当代史与当代史编研》等。

的大国地位，为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的开辟，奠定了重要基础。

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再认识的必要性

2020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曾经猖獗一时的历史虚无主义诋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的言论，掷地有声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强调“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1]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是我们认识、研究和宣传抗日战争史的重要指导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在抗日战争史的认识、研究、宣传中出现过一些偏颇，如过多强调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的一面，而对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的作用肯定不够，等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和宣传上，纠正了上述偏颇，做到了正确认识和把握国民党政府的两面性及正面战场的作用，既看到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反共、分裂的一面，又看到其联合中国共产党反抗日本侵略的一面；既看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事实，又看到其广大将士对日军英勇作战和取得的一些重大胜利。然而，在以“告别革命”为核心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甚嚣尘上的一段时间里，一些人的研究和宣传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披着学术外衣，采用文艺手段，一方面，竭力粉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掩盖其对日本妥协、退让和对中国共产党限制、摩擦的行径，人为抬高正面战场的作用，甚至为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汉奸、卖国贼辩护，散布“曲线救国”“卖国有理”论；另一方面，千方百计贬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的作用，丑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甚至编造谣言，肆意污辱为抗日流血牺牲的烈士和英雄人物。党的十八大后，这种现象在总体上得到了遏制，但在某些影视作品和互联网上，仍然不时露头。因此，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到来之际，很有必要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并以这一论述为指导，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进行再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的主要体现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至少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最早发出抗日号召并进行武装抵抗。*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是中国共产党首先并始终高举坚决抵抗日本侵略的大旗，不仅在第一时间作出和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军事侵略和占领东三省的决议、宣言，坚决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提出只有工农劳苦大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同时，主张组织民众开展游击战争，并且派出得力干部到东北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指示东北地下党建立由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最终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沉重打击了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侵华日军，有力支援和鼓舞了关内抗战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

动。此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先后发表声明，愿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抗日作战的协定，与部分国民党人实现了合作抗日，并支援和联合了各种抗日组织和军队共同抗日。中共中央还从南方革命根据地，派出了北上抗日先遣队。这一系列举措使爱国力量看到了希望，提升了信心，振奋了精神，有效遏制了妥协退让势头的扩大和各种失败论、投降论的蔓延。

第二，率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积极推动国共合作。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是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全国性的“一二九”爱国运动，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独占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政策，唤醒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激励了更多中华儿女奋起抗战，迎来了中国人民救亡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此后，又是中国共产党最先发表宣言，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强调要组织和团结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积极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西安事变后，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民族利益大局为重的方针，积极斡旋各方，促使其和平解决，并在“七七事变”后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名义、番号，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从而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筑成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钢铁长城。

第三，正确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面对代表英美等西方国家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不愿实行民主、改善民生和不敢发动依靠人民大众的片面抗战路线，以及中间力量把抗战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的实际情况，是中国共产党对战争形势及其演变作出了正确判断，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等正确方针，以及实行减租减息以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从而形成了全面抗战的路线，保证了全民族抗战的持续进行。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针对弥漫全国的“亡国论”和“速胜论”，撰写了《论持久战》，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和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相持、反攻的三大阶段，系统提出对日实行持久战的思想和一整套关于持久战的理论、战略及作战方针，为争取全国各阶层人民参加抗战指明了正确道路，极大调动了民众支持抗战的热情，鼓舞和坚定了广大军民争取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第四，积极壮大抗日武装并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打破了侵华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后，迅速开赴抗日前线，在华北和苏南、皖南、华中等地，边同日伪军作战，边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抗日武装；在东北、华南等地建立的抗日联军、东江纵队，以及由红军改编成的海南岛琼崖纵队，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同日伪军作战。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通过平型关战役、黄土岭战斗、百团大战等一系列对日作战的胜利，以及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歼灭了大量日伪军，打乱了日军的侵华部署，牵制了日伪军的兵力，使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同时通过与国民党军队主导的正面战场的互相配合、共同抗敌，促进国民党政府将抗战坚持到了最后胜利。当年，中国综合实力远不如日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在装备、给养上更是落后，之所以能发挥如此关键的作用，靠的是联系人民群众的紧密、动员组织能力的强大、统一指挥的有效、部队作风的顽强。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能拥有国民党军队一半的装备、给养，抗战胜利的时间也不会被拖

得那么长，中国人民所承受的苦难和损失也不会那么大。

第五，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动员一切力量投入抗战。面对日本侵略者将以军事打击国民党政府为主转向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及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的情况，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巩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还积极支持和帮助对日作战的国民党军事力量，主动联络、推动冯玉祥、傅作义、蔡廷锴、蒋光鼐、张学良、杨虎城、王以哲、于学忠、高桂滋、阎锡山等将领和地方实力派进行抗战或准备抗战；密切联系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谭平山等国民党左派和民族工商界、文化界、宗教界、华侨界中的进步人士，向他们宣传抗日主张，团结他们参加抗日斗争。正是中国共产党这些果断有力的行动，以及正确的战略策略和强大的组织能力，使越来越多的人把实现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国家富强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形成了全民抗战的浩大声势，为战胜日本侵略者构筑了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从而有效压制了国民党的投降暗流，迎来了全国上下的抗战高潮。

第六，正确处理国共矛盾，坚决打退和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从抗日战争一开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便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执行与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坚决抵制其对全民族抗战的动摇，揭露了其对日妥协的严重性。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的鲜明立场，得到了全国人民、中间势力、国民党内正义人士以及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数百位文化界人士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对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在山东博山、河北深县、湖南平江、河南确山等地制造袭击和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或后方工作人员的严重事件，以及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坚决回击，使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尚未发展成大规模武装进攻即被有效遏制，国内危急时局得以趋向好转。由于反击措施得当，没有给破坏团结抗日的势力以可乘之机，避免了国共合作的破裂，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维持到抗战胜利。

第七，努力进行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起到了树立救亡图存示范区的作用，为全民族抗战撑起了希望。在抗日战争中，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和密切联系群众，陆续建立起总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亿人、遍布敌后的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支撑持久、广泛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基地。为了巩固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政策。比如，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和基层选举、精兵简政，以此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在经济建设上，实行减租减息，发展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合作经济组织，以此兼顾农民和地主两方面利益；在文化建设上，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教育制度，推动形成各种形式的教育体制，成立以宣传抗日为主旨的文艺团体和大批农村剧社，开展激励人民抗战的新文化运动。在此政策背景下，抗日民主根据地呈现出一派政治民主、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政府廉洁的新气象，与国民党统治区专制独裁、官僚腐败的局面形成了强烈反差。面对日军把作战重点转向敌后战场和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政策，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还普遍掀起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实现了军民生活改善、人民负担减轻，有力支持了敌后的艰苦抗战。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为坚持敌后抗战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也为中国的社会治理树立了示范，大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同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各阶层中的威望和国际形象，为全民族救亡图存撑起了希望。

第八，涌现出无数抗日的英雄人物和事迹，为抗战胜利凝练出伟大的抗战精神。在抗日战争中，是中国共产党模范发挥了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作用，以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扎根群众、官兵平等、严守纪律、顾全大局的实际行动，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延安精神、抗联精神。这些精神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赵一曼和“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刘老庄连”等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英雄群体。这些英雄及他们的事迹，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是伟大抗战精神的载体。正是这种精神和这些英雄事迹，赢得了包括爱国进步人士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尊重，吸引了包括作家、教授、大学生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的加入，成为抗战全过程中始终引领中华民族冒着敌人炮火前进的旗帜。正如当年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的评论所说，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氛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手的愿望，这在国民党的中国是难以见到的”。[2]

只要尊重历史事实，都不难从以上八个方面看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出的中流砥柱作用。近代中国在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屡遭挫折，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和民族内部的软弱涣散。在内忧外患中诞生成长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历史事实充分表明，是中国共产党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凝聚组织起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从而洗刷了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耻辱。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将难以有正确路线的指引、广大民众的参与和强大的精神支撑，也不会有真正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再认识，把广大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2014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强调“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战略策略，开辟广大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多么险恶、战争多么残酷，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各爱国党派团体和广大人民一起，共同维护团结抗战大局。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3]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是对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最为精辟的概括。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要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这些要求不仅廓清了理论是非，校准了工作导向，更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舆论环境。我们也要看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绝不会甘心失败，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还会利用各种机会，使用各种借口，打出各种旗帜，贬低和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以此污蔑、攻击我们党的历史，妄图达到否定我们党的执政资格、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就要结

合抗日战争史，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重要论述，坚持正确的二战史观、抗战史观，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维护历史真相，以历史事实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谬论。铭记历史才能开创未来，正确认识和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正确认识中国人民抗战史和中共党史，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从而进一步增进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把广大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为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注释

[1]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4日，第2版。

[2]江宗、赵利国：《人类战争史上的新鲜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2015年6月16日，https://m.cnr.cn/news/20150616/t20150616_518860502.html。

[3]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4日，第2版。

责 编 / 邓楚韵 美 编 / 梁丽琛

Re-recognize the Mainstay Ro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Zhu Jiamu

Abstract: As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approaches, it is necessary to re-recognize the mainstay ro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correct the biases that have emerged in the research and publicity sector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Furthermo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s a great victory wher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layed the mainstay role. This role was mainly manifested in eight aspects: the first to issue the call to resi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launch armed resistance, the first proposal of establishing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nd promot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formulation of the all-out resistance line and the strategy of protracted war, the expansion of the anti-Japanese armed forces and the conduct of guerrilla warfare, the adherence to the principle of resistance, unity and progress,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anti-Japanese democratic bases and its demonstration effect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the emergence of heroic figur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orrectly recognizing and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mainstay ro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ill help people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will also help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people in the new era to more closely unite arou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continue to striv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instay rol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国担当及其重大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齐卫平

【摘要】中国以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贡献，诠释了中国肩负何等担当、如何践履担当、中国担当有何意义等问题。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最早战场，其重大意义在于确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相统一的叙事逻辑，彰显这场战争的连续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深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厚度和意蕴深度。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挽救民族危亡、争取世界和平伟大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确立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显著地位，其中体现的中国担当无比高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肩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责任，中国人民以英勇斗争的壮举为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立下不朽功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最好的纪念是珍惜和平，让战争远离世界，让世界更加美好。

【关键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最早战场　东方主战场　中国贡献
【中图分类号】E19/K26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4.002

194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这场历经14年之久的战争成为人类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给世界各国各民族留下无比深刻的警示，成为历史时刻不忘的警醒。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抗日战争在这段记忆中留下分量厚重、场面宏阔、斗争壮烈、意义重大的历史记录，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彪炳史册的重大贡献。中国担当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叙事中是不可或缺的话题，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仅对中华民族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更对人类文明的世界性进步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本文拟就中国肩负着何等担当、如何践履担当、中国担当有何意义等问题进行思考和阐释，以期对彰显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世界胸襟和道义境界有所裨益，对弘扬人类社会正义力量和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有所启迪。

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导，中国政治学会理事、原上海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著作有《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化》（合著）、《1937：悲壮抗战》（合著）等。

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最早战场的意义阐释

和平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向往与追求。这促使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反对非正义战争，形成重要的思想理念和行动准则，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人类文明在曲折中进步，历史的述说有光明灿烂的成就，也有悽惨悲怆的场景。人们深恶痛绝国家和民族间的战争杀戮，但造成殊死拼杀、践踏生命、祸及人类的战争，却总是不期而至。20世纪的100年间，不少地区爆发局部战争，更上演了两次世界范围大战的悲剧。历时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宣告结束，仅隔13年，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就发动侵华战争，点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争霸野心驱动的野蛮侵略，让战争再次降临热爱和平的人民。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机，世界遭遇更大规模灾难，人类文明遭遇正邪对决的空前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印证了部分野心家的野心从未消减。在世界局势变动中，日本、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势力结成轴心国，成为战争祸首和人类灾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建立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虽然肩负维护和平的职责，但缺乏权威性和约束力，在遏制法西斯主义邪恶势力猖獗崛起中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意大利、德国等国在国内实行恐怖主义的专制独裁统治，对外实行武力侵略和民族压迫，不断制造国际社会紧张。1919年3月，墨索里尼创立“战斗的法西斯”组织，1921年11月正式成立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1920年希特勒提出纳粹主义，推动德国走上法西斯独裁统治的道路。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协约国成员，曾与德国宣战，但始终不放弃侵略图谋，把中国作为实现其争霸世界野心的主要目标，于是便与意大利、德国法西斯主义沆瀣一气结成邪恶势力的联盟，以疯狂发动侵华战争迈出了把法西斯主义推向世界、祸及全球、践踏人类的第一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袭击奉天（今沈阳），武力侵占东北，这个事件标志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燃起侵略战争的第一把战火。日本侵占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自明治维新后就开始图谋染指中国。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与耻辱。1900年，日本加入八国联军蹂躏中国；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侵犯中国东北地区领土及主权，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企图独占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要求德国移交在中国山东的一切特权。这些事实足以表明，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不死。制造“九一八”事变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实施侵华战略的历史必然。联系当时法西斯主义邪恶势力崛起的国际背景，日本以武力侵占中国的举动，绝非中日关系的局部性事件。其以争霸世界、发动战争、践踏正义、挑战人类文明为特征的侵略行动，对国际社会造成了全局性影响。因此，“九一八”事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端。日本帝国主义由此发动的对华侵略，与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抗战，构成了法西斯主义邪恶势力与反法西斯主义正义力量殊死较量的最早战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两个阶段构成历史叙事，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为局部抗战阶段，从1937年全民族抗战至1945年取得伟大胜利为全面抗战阶段，两个阶段构成连续性的整体。“九一八”事变与“七七”事变的炮制者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坚持抗战的主体都是中华民族，阶段性的特点只是抗战格局的局部与全面的不同，没有实质区别。中国抗战的局部性指战争主要在一些区域范围进行，全面抗战指全中国、全民族投入抗战洪流。从局部抗战发展到全面抗战，14年中国抗战以无数可歌可泣的人和事，书写了中国人民不畏艰险、不惧强暴、为和平而战、为正义而争的历史篇章。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以民族

利益为重，积极推动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战，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以全面抗战的思想主张和路线方针引导抗战正确方向，凝聚起全民族抗战力量，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相互配合，中国人民在抗战中铸起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铜墙铁壁，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20世纪一个重大事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铁一般的事实载入史册，对如何认识这场战争已经形成原则性的共识。然而，局势左右、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等诸多复杂因素影响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叙事，“欧美及苏联的史学著作对中国战场在‘二战’中的作用，或轻描淡写，或故意回避，或有意贬低。这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1]认定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端，把在此之前进行了8年之久的中国抗战排除在外，就是片面突出西方国家抗战而忽略中国抗战的表现。这个偏见事实上已经引起一些国外研究者的质疑。2013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特（Rana Mitter）出版《被遗忘的盟友：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对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贡献作出了客观、公正、真实的评价，指出“中国是第一个面临轴心国侵略的国家，比英国、法国早2年，比美国早4年”。[2]这里“早2年”“早4年”的见解，是以1937年中国发生“七七”事变为比较的时间节点所作出的。事实上中国不该被遗忘的抗战还应该进一步向前追溯，1931年“九一八”事变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起点。近年来，拉纳·米特教授的见解得到国外越来越多史学家的赞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已经不能成立。正确认识这场战争的发展进程，理应让中国抗战叙事回归客观事实与历史真相。

必须指出，明确中国抗战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完全不存在邀功论赏的问题，更没有抹杀别国抗战意义的意思。德国对波兰发动战争迫使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欧洲战场的开辟表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更大规模、更广范围、更加激烈的阶段，它的重要意义毋庸讳言。但是，以1939年英法对德国宣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端，则否定了中国抗战的存在，这完全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的“西方中心主义”叙事逻辑，既不符合历史发生的客观事实，也不能反映法西斯势力瓜分世界阴谋的全部真相。与中国抗战相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也呈现从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发展的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前，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战，就全球范围而言是局部的，但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进程而言，则是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事件。法西斯主义国家向世界发起侵略扩张，以“九一八”事变为开端，中国局部抗战率先举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面旗帜，成为正义力量迎战邪恶势力的第一个战场。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3]这个论断揭示了中国抗战具有世界意义的大历史观，表明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既是为维护本国独立和民族尊严而进行的浴血奋战，也是为伸张人类正义和保卫世界和平而作出的伟大壮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构成统一的整体，把两者割裂开来是“孤立战争的观点”，无论对正确评价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还是对客观认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进程，都是错误的。

从大历史观审视，中国抗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早的战场，其重要意义在于呈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相统一的叙事逻辑。历史叙事必须遵循事实，不能被主观意志绑

架，更不允许肆意扭曲篡改。正确的历史叙事方式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从事物发展中寻找规律上的普遍联系。从表象上说，把自“九一八”事变起中国抗战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端，以时间的延长显示了这场战争的连续性、长期性和艰巨性。从本质上看，中国抗战作为最早战场增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厚度和意蕴深度。中国抗战自1931年起至1945年取得伟大抗战胜利，体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完整的时间链；东方战线最早开辟的中国战场，与此后形成的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大西洋战场连成一体，构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景的空间场。把时间链和空间场相统一加以认识，中国开辟的反法西斯主义最早战场具有串联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全过程的重要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叙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叙事纳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叙事才具有完整性、客观性、合理性。

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显著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4]“东方主战场”的定位强调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具有在认识上以正视听的重要意义。长期以来，在认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问题上存在各种偏见，除了以1939年德国发动侵略波兰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外，还有两种倾向性的错误观点。一是论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只强调欧洲战场，忽视甚至不提中国战场，把东方战场置于无关紧要的地位；二是夸大西方国家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的作用，无视东方战场中国抗战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不仅是对中国抗战的不尊重，更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非理性认识的表现。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分布，历史叙事中有两种基本的表述。一种是概括为欧洲、苏德、北非、中国和太平洋五个战场，这种概括以重大战役为主要依据。另一种是概括为东欧战场、西欧战场、太平洋战场、亚洲战场、非洲战场、大西洋战场，这种概括以发生区域为主要依据。两种角度不同的概括相互交叉，都有合理性，但从形成时间上看有先后，主次上也有区别。在德国入侵波兰和苏德战争爆发之前，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成为东方主战场，在亚洲反法西斯主义邪恶势力过程中发挥了旗帜作用。从整体观加以认识，各大战场的进展、不同区域的形势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演变都产生重要影响，各国抗战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起到积极作用。作为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显著地位，从多个方面发挥了不同凡响的积极作用，彰显了中华民族在这场声讨邪恶、保卫和平、伸张正义、捍卫文明的伟大战争中发挥的骨干力量作用。

东方主战场的中国抗战使日军深陷泥潭而难于自拔，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的阴谋。日本走上帝国主义道路后确立的总战略是争霸世界，他们的侵略野心不止于灭亡中国，还包括攻占苏联远东地区的北进战略，占领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南进战略，进军印度、印度洋的西进战略。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步是占领中国，因此，日军的大量兵力投入在中国战场。发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的侵华战争过程中，丧心病狂的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快速打败中国，然后与德、意结盟，或南进同美、英等决战，或北上进攻苏联。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总战略从实施开始就受到挫折，“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被中国抗战所击破，日本侵略军既攻占不了中国，也无法派兵到其他国家多线作战。2014年9月1日《人民日报》刊文资料显示：

1938年10月日本陆军总兵力为34个师团，其中日本本土1个，朝鲜1个，中国32个，把军事力量集中部署在中国，因此中国抗战作为东方主战场抵抗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9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总兵力51个师团，其中日本本土4个，朝鲜2个，东南亚10个，中国35个，投入在中国战场的日本陆军兵力约占其总兵力的70%。上述数据表明，日本全部军队绝大多数集中在中国，东方主战场的日军陷入困兽之斗的全面困境，中国抗战使日本帝国主义难以推行其扩张侵略的计划。东方主战场上日军遭受的失败注定了日本帝国主义总战略的彻底破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东方主战场的中国抗战沉重打击了邪恶势力争霸世界的野心。

东方主战场的中国抗战给予盟国以有力支持，欧洲等战场一些重大战役取得胜利有中国抗战的贡献。世界大战需要整体的战略配合，无论是代表邪恶的轴心国，还是代表正义的反法西斯同盟，都需要整体性的协同作战，各自战场的战斗部署、行动计划、发展局势、胜败结果相互影响。如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后，要求盟友日本从远东发起攻击加以配合，中国抗战在东方战场牵制日本军力，使日军无法抽身进攻苏联，解除了苏联在其东部国界受到的威胁。中国抗战制约着日本的“北进”战略和“南进”战略实施，有力遏制了日本争霸世界总战略的展开。中国派出远征军开赴缅甸，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支援了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斗争。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转入战略防御，急需陆军主力支援，但主力部队因陷于中国抗战的东方战场而无法如愿，这对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反攻作战形成有力支持。1945年1月6日，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曾说，“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人”，赞扬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拉纳·米特教授指出，中国抗战“为了国家不仅仅是尊严和生存，还为了所有同盟国的胜利”。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观看，中国抗战把东方与西方连接起来融为一体，成为伸张正义、保卫和平、珍惜生命、反对暴力、战胜邪恶的力量联合体。中国战事牵动着欧洲等战场的战事，西方战局影响着中国战局，东方主战场的中国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东方主战场的中国抗战站在亚洲反法西斯主义的前列，有力推动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从当时世界格局看，亚洲处于落后地位，各国普遍遭受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法西斯主义邪恶势力争霸世界挑起战争，不仅是列强之间的博弈，更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掠夺的加深，亚洲各国是严重的受害者。因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推进的过程也是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过程。在同盟国中，中国是唯一一个长期遭受殖民侵略的国家，将反法西斯主义与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相统一，成为中国抗战的特殊担当。中国共产党极其重视东方各国民族解放斗争，194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组织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参加此次会议的有日本、印度、印尼、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泰国、越南、朝鲜等国130名代表。会议决定成立“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成立东方民族学院，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法西斯主义，为东方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与解放而努力。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有力推动了亚洲各国的独立解放事业，东方主战场的中国抗战在亚洲举起抗击法西斯主义侵略的旗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树立了榜样，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谱写了浓墨重彩的民族解放运动历史篇章。

东方主战场的中国抗战高举正义旗帜，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系列重大事件上发挥了关键性、主导性的作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从一开始就自觉地秉持世界和平、人类正义的鲜明理念，在担当民族自卫使命的同时，肩负起世界和平与安全维护者的责任担当。正是基

于这样的理念，中国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有效地联合起东西方正义力量共同抗击邪恶势力。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话中提出，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中国一再向世界表示，中国作战不独求民族之解放，不独求领土之完整，也是为全世界各国之共同安全而战。“七七”事变后，中国宣布“联合世界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的抗战外交目标，提出中、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1939年2月，中国向美、英、法、苏呼吁立即与中国共同行动，开展具有同盟性质的政治、军事、经济合作。此后，中国多次建议召开旨在共同对日的国际会议。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中国决定加快寻求与美、英、苏等国结盟的步伐，一致对德、日、意法西斯宣战。1942年1月1日，反法西斯国家发表《联合国家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与德、意、日组成的轴心国具有同质性的特点不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包括26个国家，各国之间存在着很多、很大的差异，尤其是各同盟国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矛盾的摩擦，要整合在一起难度较大。中国首先倡导并以艰辛的努力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意义极其重大，贡献十分显著。

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在欧洲战场上进行，没有形成东方战场，中国作为协约国参战表示正义的立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由欧洲战场和东方战场两部分组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首先由东方战场开辟，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成为最早的战场，也因此而成为东方战场反法西斯主义的首要代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东方主战场的中国抗战成为正义力量战胜邪恶势力的历史写照，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到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取得伟大胜利，东方主战场的中国抗战堪称历史上作战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殊死较量最激烈、军力投入最充分、战斗场面最恢宏、牺牲人数最多、付出代价最大的战场，中华民族在东方主战场上作出的贡献永垂史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中国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在那场战争中，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5]事实就是事实，历史经时间沉淀形成的盖棺定论，经得起实践检验。尽管对一些战争过程中具体细节问题的认识难免存在分歧，学术讨论也属正常，但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中华民族为本民族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大贡献而引以自豪，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也赞扬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重大贡献。

关于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贡献，已经形成共识。归纳而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中国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中华民族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持续14年之久的英勇斗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奋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打破了德、意、日轴心国配合作战的抱团计划，阻止了法西斯邪恶势力争霸世界的阴谋；东方主战场的中国抗战肩负着推进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任，以出色表现和实际效果为其他区域的重大战役开展和取得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积极支持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成为同盟国在亚太地区对日作战的战略基地；中国抗日战争影响着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和走向，是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

立作出了显著贡献，中国率先倡导、积极推动、不懈努力，使国际社会摆脱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矛盾、殖民国家与殖民地国家区别、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差异等方面的阻碍因素，携手走上共同抗击法西斯邪恶势力的道路；中国为建立公平合理的战后世界秩序，主张建立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得到同盟国家赞同和支持，并在建立联合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6]以上中国贡献不仅是国内的共识，而且为国外许多政治家和历史研究者所认同。

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来说，中国贡献具有两方面的证明意义。其一，证明世界连为一体，德、意、日为轴心国的法西斯邪恶势力臭味相投结成整体，各国反法西斯力量形成代表正义的共同体。因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贡献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留下超越国界的世界级宝贵财富。其二，证明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人类正义的坚决践行者，中国贡献注解了中华民族在世界遭遇战争危机、人类文明遭遇践踏时义不容辞的担当。这样的担当除了体现在上述已成共识的中国抗战贡献外，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贡献必须补充和强调。

中国抗战的丰富理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思想财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在于中国人民经受了无比残酷、无比艰难、无比激烈、无比严峻的战争考验。中国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早战场、东方主战场，而且也是一个国家里战火波及范围最广的战场，国内10多个省区陷入战争泥潭，战区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人民深受其害，国家受摧残程度极深。而且，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物资有限、财力匮乏，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战争爆发后较长时间中国都处于劣势地位、战势呈胶着状况，如何抗击敌寇、如何克服困难、如何把握时机、如何打赢战争、如何掌握命运，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顶住各种压力，提出丰富的理论引领抗日战争沿着胜利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同志撰写的《论持久战》就是经典的代表作。在这篇纲领性文献中，毛泽东同志科学预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3个阶段，通过对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特别是通过分析时代特点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精辟论述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前途、历程和战略战术原则，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科学结论，揭示人民的正义力量不可战胜，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等真理。《论持久战》以精湛的理论坚定了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信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具体道路。这篇著作出版后不仅受到中国社会各党派、各阶层民众的热烈反响和高度评价，而且很快被翻译成了英文流传海外，毛泽东同志为《论持久战》英文版写的序言中说：“我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7]中国共产党抗战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思想武器，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尤其是世界被压迫人民反抗外敌入侵、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理论指南。

中国的伟大抗战精神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献宝贵精神财富。就中日交战而言，抗战时期中国国力确实不如日本，因此有“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的亡国论、悲观论、妥协论、投降论出现。然而，“战争不仅是物质的较量，更是精神的比拼”。[8]日本帝国主义可以凭借先进武器猖獗一时但终究长久不了，中国抗战虽然条件差但具有精神对垒的胜出优势，全体中国人民以血肉筑起的铜墙铁壁是日军轰不倒、摧不垮、攻不破的。站在正义一边的伟力激励着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在抗战时期的大爆发，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日军的侵略铁蹄踏进中国大地之时起，中国人民就开展了奋勇抵抗的伟大斗争，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无论敌人多么凶残、无论战争多么残酷，无论形势多么严峻、无论牺牲多么巨大，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动摇过血战

到底的决心。东北抗联的英勇斗争、四行仓库保卫战、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在无数惨烈对日作战中，中国人民背负耻辱奋勇向前，不间断地奏响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歌。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为抗战殉国的将领大义凛然的英勇气概令日寇震撼。中国人民用血肉之躯面对侵略者的屠刀，人人抱定必死之心前赴后继，成千上万的英雄在侵略者的炮火中奋勇前进，在侵略者的屠刀下英勇就义，彰显出中华民族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形成了爱国情怀、民族气节、英雄气概、必胜信念构成的抗战精神。伟大抗战精神不仅体现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而且深深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伟大抗战精神不仅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也从精神层面上为诠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作出了中国贡献。

中国人民的伟大牺牲记录了法西斯邪恶势力惨无人道的本性。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是牺牲人数最多的国家，付出的代价最大。自“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一半国土被侵略者蹂躏，930余座城市被日军侵略占领，占全国总数的47%以上，其中被侵占的大城市占全国80%以上。全国直接承受战祸的人口超过2.6亿。中国军民伤亡3581.9万人，其中军人伤亡413万人，淞沪会战一役伤亡就达25万人之多。这些血淋淋的数据既彰显着中国军民用生命抗击侵略者的大无畏气概，又记录了日本帝国主义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数据的意义绝不仅是证明中国牺牲之大，更在于提供了法西斯主义罪恶本性的铁证。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在中国狂轰滥炸、滥杀无辜，视人命如草芥，到处疯狂地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而且还用中国人肉体作试验，发明细菌武器残杀中国人民。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日军侵占南京后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这一惨绝人寰的血案史无前例，震惊世界，充分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的兽行和对人类文明的公然践踏。南京大屠杀期间骇人听闻的事件触目惊心，两名日本少尉竟然进行杀人比赛，把最野蛮、最残忍、最丑陋的非人性暴露在世人面前。中国人民以流血牺牲的生命代价为世界认识法西斯邪恶势力惨无人道的本性提供了有力证明。这样的中国贡献是沉痛的，也是独一无二的；是悲壮的，也是气吞山河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不能忘却中国军民英勇献身的事实，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牺牲永远值得世界的尊重。

综上所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中国贡献是多方面的，坚持大历史观、世界视野和整体意识，必须反对碎片化、片面化、局部性的认知方法，更要反对主观臆断、狭隘偏见、戴上有色眼镜的歪曲解读，要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否认事实、扭曲历史是严重的犯罪，永远不得人心。中国贡献体现中国担当，以担当作出贡献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鲜明底色。中华民族是勇于担当的伟大民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肩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责任，中国人民以英勇斗争的出色表现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为这段被战争蒙黑的历史抹上一道带着血色的光彩。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民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9]强调“历史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塑造”。[10]经历过灾难的人们担心历史悲剧再演，酷爱和平的人民反对战争阴魂再现。在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较量中，历史的天平最终总是选择正义、光明、进步，邪恶、黑暗、反动的势力无论如何猖獗，终究都抵不过正义、光明、进步的力量。胜利必定与正义相连，失败必然与邪恶相伴。光

明必定战胜黑暗，进步必定压倒反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启示我们：玩弄战争就意味着灭亡，其下场一定是自绝于人，遭世界唾弃，被历史淘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最好的纪念是珍惜和平，让战争远离世界、远离人民。二战后80年来，世界形势和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不太平，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地区性的局部战争时有发生，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单边主义以及政治控制、民族冲突、利益争夺潜伏战争隐患。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是各国各民族共同的责任担当。以史为鉴，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汲取前进动力，必须努力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自觉和精神主动维护世界和平，坚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发展人类文明。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建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ZD014）

注释

[1]胡德坤等：《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

[2]马军等：《海外与港台地区中国抗战史研究理论前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第27页。

[3]《毛泽东年谱》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35、107、107页。

[4]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7月8日，第2版。

[5][9][10]《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65、666、695页。

[6]学者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胡德坤等著《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王建朗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彪炳史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贡献》、梁柱著《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贡献》、陈登才著《伟大的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国际地位和贡献》、潘庆译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中国贡献》、胡德坤著《论中国抗日战争的世界历史意义》。

[7]《毛泽东年谱》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107页。

[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814页。

责编/桂琰 美编/周群英

China's Role in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and Its Significance

Qi Weiping

Abstract: Through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victory of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China has demonstrated what kind of responsibility it bears, how it fulfills that responsibility, and what significance its responsibility holds. As the earliest battlefield,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a lies in presenting the unified narrative logic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highlighting the continuity, long-term nature and difficulty of this war, and deepening the historical depth and profound meaning of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As the main Eastern battlefield, China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saving the nation from peril and achieving the great cause of world peace, which has established the prominent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China made various contributions to the ultimate victory of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and the Chinese responsibility embodied in these contributions is extremely noble.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bo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and the Chinese people, through their heroic struggles, made immortal contributions to the great victory of this war. The best commemoration of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is to cherish peace, keep war away from the world, keep disasters away from the people, and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Keyword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orld Anti-Fascist War, earliest battlefield, main Eastern battlefield, Chinese contribution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考察

华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陈金龙

【摘要】日本全面侵华引发深重民族危机，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引发民族矛盾和冲突，中国共产党制定并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基础。全民族抗日的共同体、民族平等的共同体、民族团结的共同体、民族自信的共同体，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与情感等多维路径。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既推动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抗日战争走向胜利，也为新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基础、积累经验。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团结
【中图分类号】D231/D6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4.003

抗日战争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艰难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从“自在”民族实体转变为“自觉”民族实体[1]的关键时期。这种转变实质上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族人民心中的确立和强化。本文拟探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缘由、内容、路径与意义，以深化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认识。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缘由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全面侵华引发深重民族危机，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引发民族矛盾和冲突，中国共产党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政策基础。

日本全面侵华引发深重民族危机。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过程中，既企图占领中国国土，又妄图离间分裂中华民族，为中华民族带来空前的危机。1927年田中义一出任日本首相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就已经明确要把中国的“满蒙地区”特别是东北地区从中国领土分割出去，以此作为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起点。[2]“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伪满政权在日本侵略者扶持下成立。针对蒙

陈金龙，华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党建学，主要著作有《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话语建构》等。

古族，日本侵略者一面实行军事欺压，一面采取拉拢上层、扶持傀儡的手段，通过“抑汉扬蒙”政策挑拨蒙汉矛盾，打出“日蒙联合”“共存共荣”“共同防共”等旗号，“七七事变”后扶植成立伪蒙政权。[3]针对回族，日本侵略者派出伪装成回教徒的奸细深入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宣扬“大回教主义”，捧出“大回回国”的旗帜，破坏回族内部的团结，挑拨离间回汉之间的关系。在西北地区以外，如平津、山东、河南、上海、香港等地，日本宣扬回教并极力拉拢有威望的阿訇教主，[4]为自己的阴谋活动站台。

日本侵略者企图分裂和灭亡中华民族的行径产生了恶劣后果。一方面，民族地区的伪政权和“高度自治”的骗局，引发中华民族内部的隔阂；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以所谓“蒙汉矛盾”“回汉矛盾”掩盖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企图弱化部分少数民族抗日的积极性，阻挠各民族联合抗日局面的形成。1940年，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关于回族与蒙古族问题的提纲各一份，《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指出：“回族中抗日救亡运动根本没有展开，少数先进青年没有力量，一部分回族民众甚至认为：‘日本人来了也不过这样坏！’”；[5]《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指出：“未沦陷区广大蒙人对抗战的认识仍然模糊，抗日的觉悟与信心异常不够，使他们对抗战实际上还是采取冷淡观望与应付的态度。”[6]可见，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引发的深重民族危机，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造成了巨大外部压力。

*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引发民族矛盾和冲突。*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主要存在两方面明显缺陷。一是理论建构上“充满了大汉族主义的民族优越感和传统的理藩政策的思想”[7]。蒋介石的“中华民族宗族论”尤是如此，认为中华民族由“多数宗族融和而成”，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8]。毛泽东同志批评国民党政府“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9]周恩来同志批评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10]二是政策实施上敷衍了事，甚至采取错误的民族政策。“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对内民族平等’的宣言，至今只是一张空头支票”，[11]未能成为现实；蒋介石在名义上“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在行动上，也实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12]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整个国家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其国家建设之重心在核心腹地的政治统合，无力顾及边疆民族地区。[13]然而，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认知与民族政策，引发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痛陈南京国民政府“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14]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才能有效避免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中惨遭分裂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制定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并实行的民族政策，主要包括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帮助民族地区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等。这些政策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继承，也是对孙中山民族主义的认可，更是基于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形成的正确认识和实践原则。从现实来看，中国共产党制定实行的民族政策，既是建立和维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也是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需要。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15]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需要凝聚全民族的力量。林伯渠同志指出：“一个对内不能团结的民族，就不能在对外战争中获得胜利。”[16]民族团结是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基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引导少数民族发展，并对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进行修复、改善和维护。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

边区和华北各解放区对待蒙回两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17]

中国共产党制定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后者引发的民族矛盾和冲突，甚至一度影响了国民党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指出，“他们有些东西是受了我们的影响的，比如，关于少数民族问题，他们现在也不得不讲民族问题了”。[18]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制定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既疏解了由南京国民政府造成的内部阻力，又有效应对了日本侵略者带来的外部压力，并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动力。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可从全民族抗日的共同体、民族平等的共同体、民族团结的共同体、民族自信的共同体四个方面来考察。

全民族抗日的共同体。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己任。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深重危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独立成为党的工作重心。就客观现实而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但各民族生成共同抗日的意愿与决心，则是中华民族迈向独立和解放的第一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抗日战争时期倾注大量心血与精力动员全民族共同抗日。1936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指出，愿意“联合回族中所有的一切武装力量，并帮助其发展，更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并“希望回民的武装，将来能成为抗日联军的主要力量之一”。[19]1937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工作给少数民族委员会的指示信》指出：“目前蒙古工作的中心，应当是抗日援绥”，并且强调“应着重解释蒙汉的联合一致抗日，这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20]这些主张，旨在动员回族、蒙古族同胞投身抗日，形成中华民族抗日共同体。“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提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21]这是全民族抗战共同体的表达。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党派、各阶级的统一战线，而且是国内各民族的统一战线。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当前的重要任务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22]张闻天同志强调，“争取少数民族，在平等的原则下同少数民族联合，共同抗日”。[23]动员全民族共同抗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取向。

民族平等的共同体。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中指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24]权利平等是民族平等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民族平等原则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

经济上的平等，主要是确保少数民族与汉族具有同等的经济权利。一方面，对于过去已经产生的经济纠纷和利益矛盾，坚持以平等原则秉公处理。1938年11月，《毛泽东等关于建立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及党的政策给周士第等的电报》提出：“对蒙人要求收回汉人侵占的土地，应使汉人出相当代价立约收买或作租佃纳租，地方政府应依具体情况分别公正处理，以团结蒙汉联合抗日为原则。”[25]秉持平等原则处理历史遗留的经济纠纷，才能化解民族矛盾和利益冲突。另一方面，对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进行规范，保护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

题提纲》提出，“一切税收应有定额，并划作蒙古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费用”；“禁止强迫侵占蒙人牧场与土地”；“废除一切苛捐、杂税、派捐、派款、征收马匹及无偿徭役，减轻水草税”。[26]这些政策，有利于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政治上的平等，主要体现在承认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拥有平等的政治地位。一方面，允许并帮助少数民族参与各边区、根据地的政治生活。《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与《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提出，政府中应有适当数目的回人、蒙人，国民参政会、参议会都应有适当数目的回人与蒙人参政员、参议员。[27]1942年4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针对民族杂居地区少数民族人数较少、难以选出参议员的情况，作出单独进行民族选举的规定，以确保少数民族有出席参议会的议员。[28]另一方面，提出在抗战胜利后少数民族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提出，“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建立联合的政权”。[29]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而奋斗”[30]。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

文化上的平等，主要体现在对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和文化独特性的尊重，反对以所谓的“大汉族主义”态度对待少数民族。此外，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中强调，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少数民族接触，“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31]文化平等要求尊重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上的自由。周恩来同志指出：“正因为中国境内各民族应一律平等，所以我们主张尊重各民族间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历史宗教。”[32]这种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态度，在《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39年）、《中共晋察冀边委目前施政纲领》（1940年）等文件中都有明确规定。民族平等的共同体，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着力点。

民族团结的共同体。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极力维护民族团结，妥善维系各民族之间亲密融洽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开展民族工作、与少数民族同胞打交道时，表现出十分谨慎的态度。1937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工作给少数民族委员会的指示信》强调：“我们的工作步骤，不能有任何使民族仇怨加深。”[33]这是审慎处理民族关系的体现，有利于增进民族团结。1941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大青山工作方针的指示》特别要求：“在蒙民地带应加强对蒙民统战工作和秘密工作，我汉人军队不应去活动，以免引起敌人注意及蒙民误会。”[34]这说明既要增进民族团结，也要注意策略方法。同时，为维护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在改善民族关系上具有主动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便将回族同胞亲密称呼为“亲爱的回族的兄弟们”，呼吁“回汉两大民族亲密的联合起来”。[35]1936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工作的指示信》亦要求，“我们在工作中联络中，必须以极忠诚的态度取得内蒙古人民兄弟的信任”。[36]此外，中国共产党力求通过情感沟通，增进民族团结。1937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强调，“同少数民族的上下层建立良好关系”，并“使他们自愿的同我们亲密的联合”。[37]同少数民族建立统一战线是增进民族团结的途径，也是维系统一战线的内在要求。民族团结的共同体，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着力点。

民族自信的共同体。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着力提振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以增强全民族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中提出，“全民族的第一任务，在于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38]

张闻天同志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应该利用中华民族过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事迹与人物，宣传中华民族的伟大，以造成民族自尊心，以击破投降妥协的心理”。[39]民族自尊是民族自信形成的前提，这里既阐明了民族自尊形成的途径，也诠释了民族自尊生成的意义。1939年1月，林伯渠同志在总结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时指出，边区政府对少数民族开展的工作主要包括“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及抗日救国的情绪和坚定其对抗战的信心”[40]。在日本全面侵华的背景下，民族自信主要表现为对抗日战争胜利的自信。《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分别将“启发并提高全回回民族坚决抗日的认识和信心”[41]、“唤醒并提高蒙古民族坚决抗日的认识和信心”[42]，作为党对回族、蒙古族具体政策的第一条，表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建立民族自信共同体的高度重视。对于中华民族整体，1939年7月《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指出，“中国之抗战建国，有汉、满、蒙、回、藏等各民族之参加”，“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历史创作”，[43]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提振中华民族自信，建立民族自信共同体，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采取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与情感等方面的措施，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

*以政治建设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民主和抗日的关系，强调发展民主政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政治制度层面鼓励少数民族参与管理。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中指出：“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事务，调节各族间的关系，在省县政府委员中应有他们的位置。”[44]这是政治民主的体现，也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政治策略层面，中国共产党主张以开明的态度、灵活的策略尽可能团结少数民族同胞，既团结少数民族普通群众，也尽可能团结少数民族上层贵族、知识分子、宗教人士。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张闻天同志对少数民族工作提出要求：“以上层活动为中心，求得上层分子的进步，不要乱把汉奸帽子戴在他们（如五马）头上”，[45]明确了少数民族工作的重点和策略。1940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绥远敌占区工作的决定》规定：“应分别具体情况按照进步的与落后的蒙古地区，上层的与下层的不同人物，公开的与秘密的不同环境，适当的使用党的策略与方法去开展蒙古工作。”[46]这是开展少数民族统战工作的基本策略。同时，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一方面，明确以党内团结引领全民族团结。毛泽东同志强调：“伟大的斗争需要伟大的力量，团结全民族，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进入这个斗争中去，是我们确定了的方针。而要达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有重大作用的，是最基本的条件。”[47]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全民族团结的基础。张闻天同志提出：“党中央应组织少数民族委员会，专门注意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研究与总结工作经验，培养与团结少数民族的干部。”[48]设置少数民族工作相关机构，是实现党对民族工作领导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中共中央关于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文件多次提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毛泽东等关于建立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及党的政策给周士第等的电报》提出：“吸收蒙人中知识分子，培养蒙民干部，做蒙民工作。”[49]少数民族干部是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

发展经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抗日战争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路径主要包括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改善民族地区基本民生等一系列因地制宜的具体政策。比如，在产业政策方面，《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提出："扶助并发展回族农业手工业生产，设立工厂，开发矿山，发展交通运输，举办实利回民的生产消费合作事业与信用借贷。"[50]《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提出："扶助蒙古人民改进畜牧生产，发展农业、手工业，开办毛织皮革工厂，发展交通运输，举办实利蒙民的生产消费合作事业与信用借款。"[51]在保障民生方面，提出禁止高利贷和贱买贵卖、调剂重要商品、救济抚恤、减租减息、取缔奸商等措施。这一系列经济政策与措施的实施，改善了边疆少数民族同胞的经济状况，奠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

发展文化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抗日战争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增进对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的了解。1939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统战部工作的指示》要求："具体调查和研究各党派各友军的情况，如有少数民族的地方，则还须调查和研究少数民族情形。"[52]这种调查，包括对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调查。《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从回族与蒙古族的历史文化出发，考察抗日战争时期两个少数民族面临的压力与挑战，剖析其内部存在的种种矛盾及解决方法，并提出针对回族与蒙古族的工作方针与策略，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效果。其次，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并帮助其发展。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提出，要"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举办回民的报纸，提高回民政治文化的水平"。[53]林伯渠同志在总结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时提出："为了发展民族文化教育，培养蒙、回民族干部，政府曾在定边县开办过一所抗日回蒙学校"，"凡边区接近蒙、回人的地方，都有定期与不定期的蒙、回文刊物和墙报"。[54]《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与《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均在教育方面提出系列明确措施：为了培育抗战建国的回族、蒙古族人才，要普遍实施国民教育，并设立各级学校；在全国重要学校招收回族、蒙古族青年入学，设立回民、蒙民班次，并安排适合于回人、蒙人生活习惯的设备。另外，针对回族的阿訇与蒙古族的喇嘛，还专门开设阿訇训练排、喇嘛训练班，提高其政治文化水平，使其为抗战的文化教育服务。[55]

基于共同抗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抗日战争时期通过共同抗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要是动员少数民族发展自己的抗日武装力量，形成各民族联合抗日的局面。1938年8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张："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56]1937年10月，刘少奇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中提出，抗日游击队包括"从伪蒙军中反正过来的队伍"和"蒙民回民组织起来的抗日部队"，"只要一有可能，共产党即为集中、合并与团结各种零散的部队成为正规军而努力。但必须以自愿为原则，反对强制的兼并或改编"。[57]《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提出，要帮助回族、蒙古族壮大抗日武装部队，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以蒙古族为例，"帮助蒙古的抗日军队，组织与强大抗日武装部，充实国防力量。发扬蒙人骑术的特长，展开并坚持敌占区的游击战争"[58]。

通过情感沟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历史充分证明，情感上相互亲近是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坚强纽

带”[59]。情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维度和重要路径。抗战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路径，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奠定情感基调，尽力消解民族间的矛盾与疑惧，强化民族间亲如一家的手足之情。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各种办法，消解各民族间历史遗留的矛盾。林伯渠同志在总结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期间，专门提到蒙、汉、回民间的历史积怨及其解决举措。在中国共产党涉及回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文件中，不论是宣传性文件还是沟通性文件，常将回族、蒙古族同胞称作“兄弟”，使亲如一家的手足之情逐渐成为民族间情感的基调。二是进行情感转化，将各民族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对伪政权的失望转化为对统一战线的共情、对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自信、对新政权的期待。《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体现出党的相关策略，“在广大下层蒙人中对日寇伪政权的失望与不满情绪也在开始增长起来，在这种情绪的增长中，生长着对抗战的同情心理，并有一部分先进的蒙人对于抗战已有了认识和希望，他们团结在八路军的周围，开始了抗日运动。”[60]中国共产党通过八路军积极活动，“给了蒙人以很大刺激和影响”，甚至使其上层王公“开始有了同情中国抗战的心理”。[61]愤怒、失望原本是消极的情感，中国共产党通过坚定地对日作战以及灵活精准地宣传引导，将这些消极情感转化为积极情感，既实现了对抗日战争的情感动员，也夯实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62]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既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为新中国成立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基础、积累经验。

*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的疆域、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明、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抗日战争时期，各民族在共御外侮的过程中，理顺了民族关系，化解了历史上存在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促进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提升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

*促进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其中不可忽略的因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效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分裂和灭亡中华民族的幻想，促进了全民族力量的凝聚，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力量基础。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成为民族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之上，抗日战争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基本社会条件。

*为新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基础、积累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取得的进展，为新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基础。同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累的经验，如结合现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措并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为新中国成立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启迪和借鉴。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3ZDA002；华南师范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何希贤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9页。

[2]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一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355页。

[3][4][5][6][11][26][27][41][42][46][50][51][55][58][60][6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12、413，295，296，416，294，419，298、419，297，418，275，299，420，299、420，420，416，416页。

[7][10][1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39、543、543页。

[8]蒋中正：《中国之命运》，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第2页。

[9][14][17][18][3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9、179、179、498、534页。

[13]罗敏：《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危机与应对：以20世纪30年代内蒙自治运动为中心的探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15][22][23][24][25][31][38][39][44][45][47][48][49]《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21、621、692、621、790、621、610、700、621、692、652、693、790页。

[16][40][43][52][5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87、73、454、145、74页。

[19][29][35][36][5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9，129，128、129，259，129页。

[20][21][33][37][56][5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4、35，473、474，36，469，481，577页。

[2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18页。

[32][3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05、549页。

[59]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4年9月28日，第2版。

[6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45页。

责 编 / 李思琪 美 编 / 周群英

A 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Effor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Forge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hen Jinlong

Abstract: Japan's full-scale invasion of China triggered a profound national crisis, while the nationalist policies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exacerbated ethnic conflicts and tensions. In respons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mulated and implemented correct ethnic policie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for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during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cluded fostering a community united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 community based on ethnic equality, a community strengthened by ethnic solidarity, and a community imbued with national confidence. To achieve this goal,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constructed multidimensional paths, encompassing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military, and emotional measures. These practices not only advanc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contributed to the victory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but also laid the groundwork and accumulated experience for reinforcing the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New China.

Keyword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ethnic solidarity

论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重塑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　何虎生

【摘要】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历时最久、规模最大、牺牲最多，且首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作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以强烈的担当精神和正确的战略擘画引领斗争实践，成为中华民族重塑的核心领导力量；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推动中国国际地位实现历史跃升，奠定了中华民族参与战后国际秩序的身份与精神基础；伟大抗战精神在血与火中铸就，既是夺取抗战胜利的精神密码，更推动中华民族精神实现重塑升华；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较量，展示了国共两党建国方略的根本分野，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方略为民族复兴指明正确道路，深刻重塑民族命运，谱写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篇。

【关键词】中华民族　抗日战争　中流砥柱　伟大抗战精神
【中图分类号】K265/D2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4.004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标志着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的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转折点，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更是世界人民的胜利，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和人类正义事业的史册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抗争，为捍卫民族独立和争取人民解放作出重要贡献，书写了气壮山河的民族史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高度评价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深刻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坚定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意志，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历史新征程！”[1]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从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中汲取力量，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心聚力、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和历史借鉴。

何虎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纪检监察学院教授、博导，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著作有《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等。

抗日战争与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2]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救亡图存为己任，于民族危亡之际毅然奋起，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始终战斗在抗战最前线，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军不战而退，东北大片国土沦陷。举国震怒之时，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维护者，率先高举抗战旗帜，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深刻揭露日军的侵华野心，严厉谴责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民众“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3]于1935年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4]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屡次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图谋，为持续凝聚抗战力量作出卓越贡献。

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强调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5]把“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6]视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剖析中日双方的基本国情和战争特点，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中国，并指出抗战要经历三个阶段，有力批驳了“亡国论”“速胜论”的错误论调，为全民族抗战指明了方向。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贯彻“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此后，党在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等地区开辟了数十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持续开展游击战争提供坚实依托。敌后战场在战略相持阶段逐步上升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有效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使其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战略困境。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群众作为抗战的根本力量。“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铁拳，才能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7]在各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组建农救会、工救会等团体以整合群众力量，制定减租减息等政策以减轻群众负担，开展民主建设和“三三制”政权建设，为持久抗战筑牢坚实的群众基础。此外，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上通过整风运动凝聚思想共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组织建设上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广泛吸纳党员，严格党的纪律；在作风建设上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推动党员干部深入群众、以身作则。党的建设使其成为思想统一、组织严密、作风优良的领导核心，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首先，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先，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随后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积极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持续壮大，加之日本侵略者实施政治诱降手段，国民党内部再度涌起投降反共的逆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度面临崩溃危险。在此关键之际，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8]的方针，坚持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成为巩固团结、凝聚力量的中流砥柱。其次，中国共产党是坚持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中坚力量。与国民党政府推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唤起民众”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道路，主张

全民动员、全民皆兵、全民参战，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力量格局，党领导的游击队伍成为东北地区坚持抗战的重要力量。党在实践中总结和发展出系统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体系，增强了全民族抗战的信心与决心，为夺取抗战胜利指引正确方向。再次，中国共产党是凝聚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核心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9]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引领力和群众凝聚力，团结起最广泛的爱国力量，扭转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乱局，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和民族气节，铸就了中华民族齐心抗战的精神灯塔，实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有效凝聚社会共识，夯实了民族团结的思想根基。抗战爆发前，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地域隔阂、阶层分化与党派纷争的复杂局面，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民众对民族共同体的整体认知。抗日战争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华民族”成为凝聚社会力量的精神纽带，民众的民族观念得以重塑。中国共产党切实发挥中流砥柱作用，肩负起凝聚民族力量的重任，“吸收最广大的群众到斗争中来”，[10]推动形成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及海外侨胞在内的广泛抗战联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其次，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根据地不断探索政治、经济与社会建设，为现代化发展积累宝贵经验。党在根据地推行民主建设与改革实践，“三三制”原则既保障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又兼顾不同阶层的政治诉求，为根据地政权建设提供经验范本。减租减息运动与大生产运动有效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打破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夯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基点，推动经济社会有序发展。再次，中国共产党淬炼民族精神，铸就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抗日战争是淬炼中华民族精神的熔炉，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展现出的坚韧不拔、英勇抗争精神，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重塑与升华。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有效打击了日本侵略者，重塑了中华民族坚韧、勇敢、团结的精神品格，正是这种在抗战中淬炼出的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战胜一切困难、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抗日战争与中国国际地位的重塑

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显著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更以坚守文化民族性与拥抱世界文明的辩证统一，为中华民族塑造了面向世界的现代胸襟，奠定了中华民族参与战后国际秩序重建的政治身份与精神根基。

*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毛泽东同志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11]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其中抗争时间最长、战争功绩显赫、民族牺牲巨大。

从时间维度看，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开辟最早、历时最久的战场。早在英、美、法等国仍对法西斯奉行绥靖政策时，中国人民就开始了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各战场中，欧洲战场于1939年9月开辟、苏德战场于1941年6月开辟、太平洋战场于1941年12月开辟，战斗时长从三年八个月到五年八个月不等。相较之下，中国战场自1931年9月开辟，至1945年9月取得胜利，历时近十四年，远超苏、美、英等主要盟国的战争时长，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单一战场。

从空间维度看，中国是亚洲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力军。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在正

面战场进行了淞沪、太原、武汉等会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在广袤国土上共同打击日寇。截至1938年，中国战场抗击了日本陆军师团所有兵力的94%；在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军被迫多线作战的1943年，中国仍独立抗击着54%的日本陆军师团。[12]这表明中国是亚洲大陆上牵制、消耗、拖垮并最终击败日本法西斯的最主要力量。

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巨大的民族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总数高达3500万人以上；按1937年美元计算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更高达5000亿美元。[13]日本侵略者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富，对沦陷区工业企业进行系统性破坏或掠夺，甚至丧心病狂地破坏民居农田，致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阻滞。中国人民以堪称伟大的民族牺牲为代价，直接杀伤日军150余万人、伪军118万人，[14]消磨日本侵略者国力，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覆灭，使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具有伟大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深刻影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进程，鼓舞亚洲民族解放运动，推动战后国际秩序重构，对亚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配合支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其他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粉碎了日本速决图谋，持续将日军主力钳制在中国大陆，使其始终无法实现兵力的战略集中与有效机动。这不仅迫使日本无法“尽快从中国撤出手来以便整顿对苏战备”，[15]间接支援了苏联对德作战；而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令日本无法在华有效“开发并取得重要国防资源”“确保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16]有力支援了英美对日作战。此外，中国战场还成为亚太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为维系盟军在东南亚作战能力、实施“先欧后亚”战略提供重要保障，从战略高度成功配合各反法西斯盟国。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鼓舞亚洲各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作为一个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同日本法西斯浴血奋战长达十四年，本身就是对亚洲乃至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的巨大精神感召。此外，中国还直接为越南、朝鲜、缅甸等国的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宝贵支持。抗日战争中，胡志明等越南革命者长期以中国为基地从事越南抗日革命活动，最终实现国家独立；金日成等朝鲜革命者参加残酷艰苦的中国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为朝鲜革命培养了坚强的干部队伍；缅甸民族独立斗争则得到了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直接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愧为引领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一面光辉旗帜。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推动战后国际秩序深刻重构。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深度参与了系列奠定战后秩序的国际法文件的制定。中国与美英两国共同发表的《开罗宣言》不仅明确“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恢复了中国领土主权；而且明确日本将被逐出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并将“使朝鲜自由独立”。[17]《开罗宣言》的条件在《波茨坦公告》中得到确认，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日本殖民占领合法性的根本否定普遍化为战后国际法基本原则，极大地推动了全球非殖民化进程和战后国际秩序重构。

*抗日战争为中国国际地位跃升奠定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中华民族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18]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出色表现所彰显的文明韧性，不仅迫使国际社会重新评估中国实力，接纳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平等主权成员，而且深刻塑造了现代中华民族兼具民族本位与全球视野的开放胸襟。

抗日战争显著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以浴血奋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先后废除了同日、德、法、英、美等国签订的系列不平等条约，部分地收回司法、关税等主权，在国际法理层面完成了从半殖民地国家到主权国家的身份转型，以战胜国身份摆脱了百年民族屈辱，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在国际关系中的被动局面。1945年，中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实现了从国际体系边缘到中心的实质性转变，重新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根本性跃升，奠定了中华民族参与战后国际秩序的身份基础。

抗日战争深刻形塑民族的国际胸襟与全球视野。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中华民族争取自身独立自由、民族解放的战争，而且是中华民族积极反对“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的力量”[19]的共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中华民族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民族目标与“保全其本国和其他各国的人权和正义”[20]的国际追求结合起来，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天下责任感，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提升至前所未有的国际广度与全球高度。抗日战争促进了中华民族外在地位提升与内在品格塑造的辩证统一，奠定了中国以积极、平等姿态参与战后国际事务的物质与精神基础，书写了当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一步提高国际地位的深层历史动因。

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塑

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与政治的较量，更是对民族精神的重塑和淬炼。作为抗战胜利的深层密码，伟大抗战精神将文化认同转化为强大的现实力量，将分散的社会力量凝聚为协同抗敌的整体效能，将民族自信熔铸于中华儿女的精神血脉，在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伟大抗日战争铸就伟大抗战精神。伟大抗日战争弘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基础。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救亡图存”上升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从政治层面的国共两党合作，到各民族的协同抗敌；从国内各阶层的携手奋战，到海外华人华侨的鼎力支援，全体中华儿女“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21]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凝聚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伟大抗日战争坚守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在英勇抗战中捍卫民族尊严与精神独立性，构筑起中华儿女“抗争到底”的精神防线。这种抗争不仅是军事层面的抵御，更是民族生存意志的集中彰显。这种民族气节打破了近代以来民族抗争中的心理弱势，重塑了民族自信的精神内核，将分散的群众力量凝聚为集体意志，将民族认同、家国情怀升华为“抗战到底”的价值共识，为持久抗战注入精神动力，最终推动抗日战争从精神觉醒走向胜利实践。

伟大抗日战争彰显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抗争意识，依靠顽强斗争开辟新胜利。这种气概将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转化为直面强暴的现实力量，形成了“以斗争求存续”的生存智慧。从平型关大捷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到敌后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的持久战略，再到台儿庄战役“用血肉填满壕沟”的阵地坚守，充分展现了不退缩、不妥协、不动摇的斗争精神，引领中华民族不断开辟新的胜利。

伟大抗日战争增强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和精神基石，在破局开路中把握历史主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科学研判战争演进规律，构建起“持久抗战”的实践路径，一步步积累局部优势，叠加聚变为全局胜势，支撑中华民族在战略上从被动转为主动，实现化劣为优、以弱胜强、反败为胜，在绝境中存续、于困厄中奋进，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伟大抗战精神是抗日战争胜利的精神密码。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团结抗战的精神指引。中国共产党既是夺取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也是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先锋力量。回望民族救亡的艰难历程，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的磅礴伟力，认识到“只有团结与统一工人、农民及一切劳苦群众，才是民族抵抗的力量与胜利的保证”。[22]为此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和宣传工作，唤醒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彰显了党和群众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结，将潜在群众资源转化为现实抗争力量，为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群众基础。在伟大抗战精神的引领、感召和激励下，越来越多优秀的中华儿女加入抗战队伍，在党的领导下投身抗日救亡的时代浪潮。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华儿女团结一心、顽强抗争的精神根基。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暴行带来深重民族灾难，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内部分裂和隔阂，促使“民族存亡”成为超越地域分野与阶层差异的核心共识，唤醒了中华儿女共同的民族意识。在伟大抗战精神的驱动下，全国人民齐心参与到“共御外敌”的历史进程中。伟大抗战精神将个体意志整合为民族抗争的整体动能，成为中华民族在艰苦抗战中团结抗争、永不屈服的精神根基，支撑中华民族最终夺取抗战胜利。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战胜磨难、浴火重生的精神支柱。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中华民族命运的关键转折点。在抗战中铸就的伟大抗战精神，凝聚起中华民族的团结力量，使全民族在抗争中形成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抗战胜利不仅洗刷了近代以来的民族耻辱，更实现了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觉醒和升华。伟大抗战精神所蕴含的坚韧不拔、团结奋进、爱国奉献等品质，成为中华民族在战后重建家园、推进国家建设、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助力中华民族不断战胜磨难、实现浴火重生。

伟大抗战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强化文化认同，凝聚全民族抗战的实践合力。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心理认同基础，然而在近代初临列强侵略的危难时刻，这种文化认同尚未完全转化为现实的抗争力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黄河大合唱》等文艺创作为媒介，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爱国理念与抗战的现实需求相结合，激发民众深层的文化认同与爱国情怀。同时，在根据地广泛开展组织动员活动，将文化认同和救国热情切实转化为抗战行动：工人生产武器弹药支援前线，农民踊跃缴纳公粮、送子参军，知识分子热情投身抗战宣传，由此形成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强大合力，实现了中华民族精神从文化心理层面到实践层面的升华。

打破传统隔阂，实现超越阶级党派的团结联合。抗战前，中国存在着阶级、党派、地域等多重隔阂，严重阻碍民族力量的整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内部，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突破传统阶级壁垒与党派藩篱的束缚，在“抗战救国”的核心目标下整合不同阶级党派的力量。这种超越阶级党派的团结联合，在精神层面重塑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集体意识，在实践层面构建起覆盖全军全民的统战体系，不仅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华民族精神注入新的内涵，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开展深度宣传，激发民族自信和精神觉醒。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诸多以弱胜强的辉煌胜利，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经典战例。同时，中国共产党创新开展宣传工作，通过新闻报道、文艺创作等方式广泛传播胜利信息，具象化展现了中国人民反抗

侵略的坚韧力量，向全国民众清晰勾勒出“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的光明前景。这极大鼓舞了民族士气，唤醒了长期以来因列强侵略而备受压抑的民族自信心。这种民族自信的觉醒成为中华民族精神重塑和升华的重要标志，激励中华民族在时代发展中不断奋勇前进。

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命运的重塑

抗日战争最深远的意义，在于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推向历史前台。在这场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两党围绕抗战建国方略展开激烈较量，实质上是两个截然不同“中国之命运”的全方位斗争，其胜负不仅为战后中国选定了发展道路，更决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走向，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命运。

*两个“中国之命运”之争体现两种抗战建国方略的根本对立。*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并非单纯的理论论辩，而是在思想、政治、经济、军事层面的全面碰撞。这场较量始源于顶层设计的根本对立，表现为截然不同的实践路线，最终选择取决于中国人民的人心向背。

两种抗战建国方略首先在思想理论的顶层设计上对立。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尝试回答“中国向何处去”[23]的问题，构想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24]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前途。与此相对，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实质上以“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国民党即中国，中国即国民党”[25]为中心思想的《中国之命运》，抛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建国方案。这两种构想在国家前途的根本问题上呈现零和格局。

顶层设计的截然对立必然在实践中具体化为两条路线的激烈较量。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在国统区维持高压统治、压制民主权利、扩张官僚资本，导致国统区吏治腐败、经济凋敝，军队士气低迷，豫湘桂战役的溃败即为其系统性危机的集中爆发。而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26]坚定执行全面抗战路线，通过群众动员、开辟敌后根据地以及民主建政与发展生产，凝聚起支持抗战的强大力量。到党的七大时，中共党员发展到121万，解放区人口发展到9550万，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民兵发展到220万。[27]以上情况展现出两种方略在实践中的巨大差异。这场全方位的实践较量最终以民心向背为裁决。政治黑暗、经济崩溃、军事溃败的国民党在抗战中逐渐丧失民心。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抗战功绩不愧“八载干戈仗延安”，真诚的民主实践堪称“只见公仆不见官”，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广泛拥护。抗战结束之际，人心向背大势已然明朗。以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通过若干迈向民主联合政府的协议为标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建国方案在道义和人心上已然破产，表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影响下选择了通往新民主主义的建国道路。

*两个“中国之命运”之争为中华民族找到正确的复兴道路。*抗日战争中两个“中国之命运”之争是一次深刻的道路选择，真正开启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进程。

选定新民主主义道路，其首要意义在于终结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政治方向上的迷茫。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提出的救亡方案纷纷破产。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使中国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28]新民主主义道路在抗日战争血与火的严酷考验中最终胜出，证明了其作为唯一有效路径的历史合理性。正是理论选择与实践检验的紧密结合，使其成为得到人民信赖的最终选择，从而终结了近代中国的百年道路迷茫，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确定性。

选定新民主主义道路，其历史意义在于确

立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国民党政权依附于英美帝国主义，无意更无力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相反，中国共产党依靠生产关系变革与广泛社会动员打破经济封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毛泽东同志提出党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29]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理论与实践，预示了新民主主义道路必然导向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模式，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沦为外部势力附庸的命运。

选定新民主主义道路，更深远的意义在于结束近代中国“体用分裂”，即无法将近代化之“用”与封建腐朽之“体”相融合的困境。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30]的历史性命题。据此，中国共产党总结并承继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文明遗产，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开创革命的中华文明之新“体”，标志着中华文明首次在革命实践和科学理论基础上走向“体用结合”，开启了新的自我扬弃和现代化转型的伟大进程。

两个“中国之命运”之争实现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层重塑。抗日战争中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历史博弈，系统性、根本性重塑了中华民族的命运，终结旧有的政治传统，颠覆传统的社会结构，使劳动人民成为历史主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根基。

这场斗争重塑中华民族的政治命运。国民党政权由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之官僚体系腐化无能，不得不延续“皇权不下县”的“代理政治”，在抗战中暴露出无法有效整合国家、动员全民的深重弊病。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组织化、纪律化与群众化的根据地建设实践，初步锻造出一个具有强大组织动员能力的政治共同体，彻底终结了中国精英“代理政治”的传统，实现了对群众的普遍组织与深度动员，并随人民解放战争胜利推向全国，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共同体由此形成。

这场斗争改变中国社会的演进方向。在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下，广大劳动群众长期处于失权失语的被动地位。中国共产党在《评〈中国之命运〉》中指出，“我们这民族的绝大多数”是“工农群众”，“只有劳动人民至上才是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彻底扭转了“一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总是盗窃民族为私有”[31]的历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为工农大众赋权，使劳动人民首次作为决定民族命运的主体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由此实现了将中国社会演进方向确定为实现最大多数劳动人民利益的历史性转向。

这场斗争推动国家功能的范式转换。中国历史上一切旧的国家机器，其根本职能是维系少数统治阶级的阶级压迫。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方案则赋予国家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带领全体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这一根本转变，使我国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地位历史性地超越政治统治职能，国家随之成为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建设性力量。上述三重维度的结构性变迁，最终彻底重塑中华民族的发展命运，使其历史性地走向伟大复兴，抗日战争也由此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本文系贵州省社科规划重大招标课题“共产党人‘心学’的理论品格、当代价值及其实践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3GZZB21）

注释

[1][2][9][18]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77、277、279、276～277页。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第548页。

[4][10][21]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15、263、18页。

[5][6]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36、35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51页。

[11]《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5页。

[12][13][14]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统计》，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第176、179、179页。

[15]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页。

[16]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页。

[17]人民出版社编：《台湾问题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5页。

[19][20]王铁崖、田如萱、夏德富编：《联合国基本文件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页。

[22]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年，第120页。

[23][24][26][3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2、675、511、534页。

[25][31]解放社编：《评〈中国之命运〉》，邯郸：华北新华书店，1949年，第25、6页。

[27][2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6页。

[2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32页。

责 编 / 杨 柳　美 编 / 梁丽琛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e Husheng

Abstract: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s the Chinese people's longest and largest fight against foreign aggression in modern times, which came with the greatest sacrifice but led to Chinese people's first complete victory in national liberation. As the mainstay role of the entire nation's resistanc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led the struggle with a profound sense of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and correct strategic planning, becoming the core leading force for national rejuvenation. As the main Eastern battlefield in the global war against fascism, China's battlefield propelled the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anding to a historic elevation, laying the foundational identity and spiritual groundwork for the Chinese nation's participation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great spirit of resisting aggression, forged through trials of blood and fire, served not only as the spiritual key to victory but also drove the profound reconstruction and elevation of the great spiri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ntest between the "Two Destinies of China" revealed the fundamental divergence in the state-making blueprints of the CPC and the Kuomintang. The CPC's New Democratic approach to state-making illuminated the grounded path for national rejuvenation, profoundly reconstructed the nation's destiny, and marked a definitive new phase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s march towar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Keywords: the Chinese Natio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mainstay role, the Great Spirit of Resisting Aggression

敌后游击战方针的提出及其体现的战略远见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原主任　罗平汉

【摘要】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红军必须适应由国内战争到反侵略战争的转变，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八路军、新四军不但在数量上与日军相比处于劣势，更重要的是武器装备也严重落后于日军，唯有游击战方能在打击敌人的同时保存和发展自己。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八路军各部迅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相继开辟抗日根据地，逐步形成与正面战场相呼应的敌后战场。游击战中“游”是手段、“击”是目的，“游”是为了更有力地“击”，认为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游而不击”是罔顾事实的无理指责。没有八路军和新四军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人民武装的敌后游击战，就不可能有敌后战场的开辟与坚持，而没有敌后战场就不可能有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关键词】抗日战争　敌后游击战　人民武装　战略远见
【中图分类号】E297.3/K26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4.005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此为导火线，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战争中探索出因地制宜的灵活战法。土地革命战争特别是红军反“围剿”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作战方式是运动战。在国内战争转向反侵略战争的历史关键节点，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红军改编之后必须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后来又将山地游击战扩展为平原游击战、江河湖泊游击战，从而使敌后游击战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对日作战的主要方式。历史证明，敌后战场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方式是完全正确的，显示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名伟大战略家的远见。

罗平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原主任、教授、博导，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才入选人。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主要著作有《土地改革运动史》《农业合作化运动史》《当代历史问题札记》等。

敌后游击战方针的确定

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主要采取的是攻坚战，一路攻城掠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红军，在根据地刚开辟、应对国民党军的“会剿”之时，主要采取游击战方式，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十六字方针，就是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井冈山时期提出来的。随着较大面积根据地的建立，红军主力兵团开始组建，国民党军对根据地的进攻也由“会剿”转变为“围剿”，唯有较大规模的运动战才能大量歼敌并打破“围剿”，红军的作战方式也由游击战为主转变为运动战为主。中央红军前四次反“围剿”斗争，都是靠运动战的方式取得胜利。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在于博古、李德放弃了以往红军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而采取“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即国民党军修筑碉堡，红军也修筑碉堡，同时采取所谓的“短促突击”战术。由于红军缺少重武器和攻坚作战经验，而国民党军拥有大量火炮甚至飞机、坦克，导致红军既不能攻破国民党军的堡垒，又无法守住自己构筑的堡垒。国民党军却持续运用“堡垒战术”向根据地腹心地区推进，造成根据地面积、人口不断减少，最后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红军主力奔赴抗日最前线提上日程。1937年7月13日，毛泽东同志致电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叶剑英同志，要求其积极同国民党的中央军、东北军及第十七路军等部进行接洽，协商对日作战的总方针。7月14日，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等又致电叶剑英同志，让叶剑英同志通过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1]在红军即将改编并开展抗战的情况下，抗战中采取什么样的作战方式，就成为亟待作出决策的重大问题。很显然，过去与国民党军队作战，阵地战非红军所长，现在与武器装备、作战训练都强于国民党军的日军作战，更应避免阵地战。因此，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电报中特地让叶剑英同志告诉蒋介石：“惟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特长于同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方。”[2]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7月30日，天津为日军所占。从“卢沟桥事变”发生到平津沦陷仅用二十余天，而当时防守平津的西北军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多达十余万人，这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意识到，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后，不适合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也应避免集中作战，而应开展分散的游击战。8月1日，毛泽东同志和张闻天同志在电报中明确指出，红军的作战原则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3]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抗日力量应采取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为使即将奔赴前线的将领们深刻认识游击战的重要性，8月4日，毛泽东同志和张闻天同志又致电周恩来同志与朱德同志等，提出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必须采取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任务的部队，“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4]8月5日，毛泽东同志和张闻天同志再次电告周恩来同志与朱德同志等：“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5]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的洛川召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集中讨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国共关系和对日作战方针问题。对于前一个问题，会议强调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对于后一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明确指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

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以“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为作战原则。

自1930年夏天，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胜利会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以来，主力红军长期开展运动战，这种作战方式不仅能消灭大量敌人，而且容易取得战场缴获，经过几年的战争磨炼，广大指挥员对于运动战相对得心应手。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高涨，有的红军将领也急于打大仗胜仗，以提升红军的影响力，回应全国人民对自己军队多打胜仗的期盼，而游击战规模小、影响也不如运动战大。主要作战方式由过去的运动战为主，转变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毛泽东同志后来指出，对于这个问题“曾经在中央和一部分军事干部之间发生过严重的争论”。[6]在洛川会议讨论过程中，有与会者提出红军的作战方针“还是运动游击战好”；[7]也有与会者主张在“不失时机的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所以还是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8]这表明当时党内一部分干部还是不愿放弃运动战的作战方式。囿于特定的时代背景，此时产生的关于军事方针的不同意见属于正常现象。据参加了洛川会议的萧劲光同志回忆：“当时，有一部分同志主张以运动战为主，部队开出去后先集中兵力打几个大仗，扩大我军的影响，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毛泽东同志则在会上反复强调游击战最能发挥红军的特长，既能有效地打击敌人，也有利于发动群众抗日。“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9]

1937年8月22日，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不久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但仍习惯称八路军）。8月下旬到9月初，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〇师从陕西韩城的芝川镇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开赴抗日前线。10月上旬，第一二九师也从这里渡过黄河进入山西。随着八路军抵达抗日前线，毛泽东同志“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些同志蛮干”，[10]一再强调八路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他在9月17日给朱德同志、彭德怀同志、任弼时同志等的电报中特别提醒前方将领：“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11]

八路军挺进抗日前线之时，主要活动区域是山西。日军用短时间内占领平津地区后，山西成为其重点进攻目标。当时统治山西的阎锡山，处于抗战打不过日本人，不抗战又会失去统治山西的合法性的矛盾之中。为应付社会各界对山西抗战的期待，阎锡山决定将其兵力摆在长城的雁门关、平型关一带，并希望八路军参战。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给彭德怀同志的电报中特别强调：“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12]毛泽东同志对认准的事情一向紧抓，更何况从运动战到游击战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因此，他“对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唯恐在行动中由于思想不统一而出现偏差”。[13]9月25日，毛泽东同志就华北工作问题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其他各项工作，不论是统一战线工作、兵运工作、群众工作，都“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并且强调：“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14]

1937年9月下旬平型关战斗一结束，毛泽东同志在致电前方庆贺胜利的同时，提醒前方八路军总的作战方针依旧必须是游击战。9月29日，毛

泽东同志致电前方负责人时指出，阎锡山组织的抗战只会是暂时的，而且阎一定要求八路军配合他打一两仗，以便给他的晋军带来好的影响，如果条件确实有利，八路军当然也可以参与阎组织的抗战，但“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15]10月中旬，中共负责同阎锡山联络的彭雪枫同志报告毛泽东同志：日军一部从天镇向广灵发动进攻，另一部自蔚县向大同方向急进，阎锡山拟集中14个团的兵力与日军展开决战，希望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作战。10月16日，毛泽东同志作出指示：“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16]

这年10月13日至11月2日，中日双方在山西忻州一带展开忻口会战，中国军队以伤亡10万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2万余人，创造了全民族抗战以来华北战场中国军队歼敌的最高纪录。但是，忻口会战未能阻滞日军的进攻，11月2日，中国守军奉令撤离忻口阵地，向太原撤退。11月8日，太原失守。

在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同志就致电前方将领，强调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17]11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给朱德同志、彭德怀同志、任弼时同志并告周恩来同志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八路军的“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18]

全民族抗战初期，日军向华北地区大举进攻，致使我国大片国土沦陷。但是，由于日军兵力有限，只能占领大中城市和交通线，对于广大农村包括一部分县城，仍无力占领。由于对日本强大军事力量的畏惧，日军还没有抵达，这些地方的国民党方面的党、政、军、警人员已经闻风而逃，地方政权随之瓦解，人心惶惶，地方管理处于真空状态，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组织动员群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有利条件。徐向前同志就此回忆道：“那时，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不甚了了，总想集中兵力打仗，不愿分兵发动群众。毛主席的这一部署，十分及时，对我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壮大自己，有重要指导意义。”[19]

敌后游击战体现的远大战略眼光

抗日战争时期，在军事上，敌我力量悬殊，呈现明显的敌强我弱形势，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将游击战作为主要作战方式。毛泽东同志指出：“敌以少兵临大国，就只能占领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由是，在其占领区域，则空出了广大地面无法占领，这就给了中国游击战争以广大活动的地盘。”[20]我国国土面积广大，地域辽阔，日军虽然整体军事力量强大，但兵力相对有限，重点只能放在占领重要城市与交通干线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如采取正面决战这样的方式是无甚意义的，唯有积极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才能在打击敌人的同时，保存和发展自己。

1937年9月中旬，为了配合国民党第二战区即将开展的忻口会战，阻滞日军向太原方向的进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根据总部命令，进至晋东北灵丘县和繁峙县交界的平型关附近的大营镇待机。9月20日，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占领灵丘县城，并继续向平型关进犯。第一一五师得知情况后，决定在平型关东北利用有利地形设伏，以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的日军。9月25日清晨，日军大摇大摆地沿着灵丘至平型关的简易公路西进。早上7时许，日军全部进入我军设伏地域，第一一五师立即抓住有利战机，迅速向沟底公路上的日军发起猛烈攻击。日军在经过初期的

慌乱之后，在飞机掩护下疯狂反扑，企图突围，八路军与之展开白刃格斗，激战至中午13时，将被围日军全部歼灭。与此同时，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和骑兵营在灵丘、涞源方向成功阻击日军增援部队，使日军无法增援平型关，保证了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平型关战斗共歼灭日军一千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马车二百余辆，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八路军挺进华北作战取得的第一场大胜利，也是中国军队自“卢沟桥事变”以来对日作战的首个大捷，它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同时大大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平型关战斗的有第三四三旅2个团、第三四四旅1个团，共约6000人（当时八路军每师辖2个旅、每旅辖2个团）。进入第一一五师伏击圈的日军部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新庄淳中佐率领的一个汽车队约500人，另一部分是桥本中佐指挥的一个辎重大车队近600人。虽然这两支日军实际是从灵丘向平型关运送物资的部队，是日军的后勤部队而非主力作战部队，但在战斗中仍显示出较强战斗力，整个战斗持续了6小时。

参加平型关战斗的八路军将士都是久经沙场的老红军，敌我兵力之比达到近六比一，八路军在数量上具有绝对优势，而且这是典型的伏击战，八路军预先埋伏在公路两旁陡峭的山腰上，日军则在狭窄的山间公路上通行，地形于我军绝对有利，但在战斗中八路军仍付出重大牺牲。在争夺半山腰的老爷庙高地战斗中，我军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与日军汽车队四五百人反复冲杀，战斗场面十分惨烈，该团三营九连原有140人，战斗结束后只幸存10余人，连排干部几乎全部牺牲。据亲历者回忆：“战斗打响后，第一批伤员约有五六十人于中午过后不久便运抵师救护所。”“全部收转工作持续了四五天。前后共收转了约八九百人。此外我方在战场上阵亡约二百余人；轻伤能随团队活动，不需转到后方医院治疗的伤员约三四百人。这样，战斗中我全部伤亡约一千五百余人。”[21]这场战斗的惨烈与残酷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一方面，平型关这样的大捷可以极大鼓舞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八路军改编之初全军按编制为三个师4.5万人，实际人数与此不差上下，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各师都留下了一部分部队组成八路军留守兵团，开赴抗日前线的每师人数在1万人左右，三个师全部加在一起约3万人，仅相当于日军一个比较大师团的兵力。因此，总体而言敌我力量悬殊，如果始终采取正面阻击这种阵地战作战方式，若干次大的战斗下来，所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

如果说在洛川会议上，对于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八路军高级将领的认知还不完全一致的话，经过平型关战斗，在这个问题上，全军已达成共识。当时，八路军、新四军与日本兵力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并且武器装备与日军相比也是远远落后，其武器装备大部分来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同国民党军作战时的战场缴获。此外，经过长征，原有的一点重装备也基本被轻装。正如周恩来同志后来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敌人装备好，我们只好上山，开展山地游击战。”[22]

历史证明，人民军队的主要作战方式，由十年内战时期的运动战为主，转向全民族抗战阶段以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为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23]徐向前同志的回忆录中提到，“因为没有独立自主，就会失去党对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前途可想而知；不是着重于山地，红军便没有可靠的依托和周旋余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发展壮大自己；离开了游击战为主的作战形式，以几万红军去同几十万日军硬拼，那就等于送上门去被敌人消灭，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有人主张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红

军兵力全部出动，开上去多打几个漂亮仗。毛泽东同志认为，根据现时的敌情我力，还不能那样干。”“这些基本思想，表现出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24]

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陷后，八路军各部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确定的敌后游击战方针，迅速深入敌人后方开辟抗日根据地。第一一五师一部以五台山为中心建立了华北敌后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接着，第一二〇师创建了晋西北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开辟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第一一五师主力以吕梁山为中心建立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武装与后来进入山东的第一一五师主力一部创立了山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组建后，也迅速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在皖西、皖南、苏南等地开创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总人数达到了5000万以上，逐步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

游击战并非“游而不击”

游击战最大的特点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样既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又能比较有效地保存自己。这种作战方式决定了其战斗规模较小，每次歼敌的数量较少，积小胜为大胜，从表面上看没有运动战特别是阵地战那样浩大的声势。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广大的游击战争和人民抗日运动将疲惫这一大批日本军 ，一方面大量地消耗之，又一方面进一步地增长其思乡厌战直至反战的心理，从精神上瓦解这个军队。”[25]游击战不仅能蚕食敌军部队，还能够在精神上摧残敌人，打击敌军士气。

在敌后战场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方式的同时，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作战方式，主要是采取大规模的阵地战，并多次组织参加兵力甚多的大会战，如全民族抗战初期的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其中包括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抗战中期的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枣宜会战、鄂西会战、桂南会战、滇西会战、常德会战等，抗战后期的衡阳会战、桂（林）柳（州）会战、湘西会战等。国民党军投入这些会战的兵力少则上十万人，多则近百万人，一时声势甚大。由于日军武器装备、军队训练、战役组织诸多方面都要远强于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在全民族抗战爆发不久中国原本弱小的空军几乎全部损失，日军完全取得制空权的情况下，虽然参加会战的国民党军的兵力往往是日军的数倍，但这些会战大多以国民党军的失败而告终，与之相伴的是国民党军付出重大伤亡，其中包括一些高级将领在会战中阵亡。

在全民族抗战的前期、中期，国民党方面在组织正面战场的各种大会战的同时，也曾在敌后留下过一些部队。由于国民党的敌后部队不能有效地组织动员群众，又没有真正学会游击战术的精髓，还适应不了敌后的艰苦环境，加之其内部派系林立，因而在敌后难以建立根基，也就无法生存，要么受日伪的打击而溃散，要么经受不住日伪的引诱而投降，摇身一变成为伪军，因而在全民族抗战中国民党的敌后部队几乎毫无作为，其组织的敌后游击战收效甚微。“总计开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原来不下一百万（一九四一年中条山战役时期的统计，华北约有八十万，华中约有二十万），由于政策错误和受不了艰苦磨炼，绝大部分被敌人消灭或投降了敌人，留在原地的及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26]国民党顽固派一方面因自己在正面战场组织的各种大会战损失惨重，另一方面不愿意看到坚持敌后游击战的中共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又不甘心自己敌后作战的失败，于是无中生有地攻击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游击战是“游而不击”。

认为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游而不击”完全罔顾历史事实。比如，1939年4月，八路军

第一二〇师在河北河间县的齐会战斗中，创造了在平原地区一次歼灭日军700余人的战绩；1939年5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山东肥城县的陆房战斗中突破日军8000人的重围，以伤亡360余人的代价，消灭日军近千人；1939年11月，晋察冀军区部队在河北涞源县的黄土岭战斗中，击毙日军有“名将之花”之称的阿部规秀中将。特别是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二〇师和第一二九师各部集中105个团20余万人，在华北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对日作战，即百团大战。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共作战1800余次，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虏日军280余人、伪军1.8万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百团大战后，这样的战斗仍然不在少数。如1942年5月，八路军晋绥军区部队在山西兴县的田家会战斗中，共歼灭日伪军500余人，其中击毙日军350余人，俘虏日军25人；1944年3月，新四军第一师在江苏淮安县的车桥战役中，歼灭日伪军940余人，其中日军460余人；1945年4月中旬，新四军苏中军区在江苏宝应县和高邮县间的三垛河口战斗中，歼灭日伪军1800余人，其中击毙日军240余人、俘虏日军7人；等等。至于规模与之相比小一些的战斗，更是举不胜举。

如若八路军、新四军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抗日武装在抗战过程真是“游而不击”，那敌后战场的开展与坚持恐怕将成为“一纸空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能在抗战中发展壮大也就无从谈起。全民族抗战之初，中共党员约4万人，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总人数不过数万人，根据地仅有一个百余万人的陕甘宁边区，至1945年抗战胜利之时，中共党员发展到120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30余万人，根据地发展到大小19块，根据地总人口达到1个亿。其中蕴含的道理不言自明，这些敌后抗日根据地本是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面前，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不顾人民的安危望风而逃，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带领自己的武装深入广大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收复大片国土，创立根据地，发展人民武装，广大人民群众也从中看到了希望，于是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早在1939年10月，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同志就曾指出：“在敌人后方，想不打敌人而保存自己是不可能的。只有把敌人打怕了，才有存在和休息的机会。有人骂八路军‘游而不击’，倘若八路军真的游而不击，那末他会老早已不能在华北存在了，更不用说到发展。”[27]为了消灭敌人，有必要保存和发展自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既游且击”，而且“游”是为了更有力地“击”。没有八路军和新四军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人民武装的敌后游击战，就不可能有敌后战场的开辟与坚持，而没有敌后战场就不可能有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敌后游击战在全民族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注释

[1][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2～3、3页。

[3][4][5][11][12][14][16][17][18]《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0、22～23、25、47、53、57、85、111、116页。

[6][20][23][2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1、484～485、551、465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86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1904—1950）》，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45页。

[9]《肖劲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204页。

[10][13]《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286、286页。

[15]《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页。

[19][24]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45、335页。

[21]欧阳奕：《平型关战斗中敌我伤亡情况的一点回忆》，中共灵丘县委党史研究室编：《灵丘党史资料·纪念平型关大捷五十周年》，1987年编印。

[22]《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92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32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19页。

责 编 / 方进一　美 编 / 周群英

The Proposal of the Policy of Guerrilla Warfare Behind the Enemy Lines and Its Strategic Vision

Luo Pinghan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nation's full-scal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Comrade Mao Zedong repeatedly emphasized that the Red Army must adapt to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domestic war to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carry out independent guerrilla warfare in areas behind the enemy lines. The Eighth Route Army and the New Fourth Army not only had a numerical disadvantage compared to the Japanese army,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ir weapons and equipment were seriously inferior to those of the Japanese army. Only guerrilla warfare could enable them to strike the enemy while preserving and developing themselves. After the fall of Taiyuan in November 1937, all units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quickly advanced into the areas behind the enemy lines to carry out guerrilla warfare, successively opening up anti-Japanese bases and gradually forming a battlefield behind the enemy lines that corresponded to the frontal battlefield. In guerrilla warfare, "moving" was the means and "attacking" was the goal. "Moving" was to strike more powerfully, and the accusation that the Eight Route Army and the New Fourth Army "move without attack" during the war was unjustifiable and groundless that disregarded the facts. Without the guerrilla warfare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the New Fourth Army and other people's armed forces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areas behind the enemy lines,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open and persist in the battlefield behind the enemy lines, and without the battlefield behind the enemy lines, there would be no ultimate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Keyword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guerrilla warfare in areas behind the enemy lines, people's armed forces, strategic vision

1931—1945年中美苏联合抗日与日本“大东亚秩序”的破灭

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宋德星

【摘要】日本与东亚大陆体系的互动及其追逐强权的机会主义国际秩序观，形塑了其关于国际秩序的基本观念及对外行为，这也是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外侵略行径的重要内因。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救亡图存的真正全国性的抗战和肩负着伟大责任的反法西斯同盟的联合作战，具有革命性和世界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仅是侵略与反侵略的生死较量，也是文明与野蛮的生死较量，需要从国际秩序演进和世界历史进程的高度来审视和理解。这样才能有力彰显中美苏作为主要战略力量联合抗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重要贡献，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反法西斯战争　美国　苏联　日本“大东亚秩序”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4.006

2025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重要日子，回顾80年前抗日烽火，中美苏作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力量，在远东太平洋地区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扩张，既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又是一场文明与野蛮的对决，直接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和人类历史走向。中国人民历经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不仅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1]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革命性[2]，需要从国际秩序演进视角审视，并将其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之中来把握。据此，本文重点探讨以下四方面问题：日本与东亚大陆体系的互动及其追逐强权的机会主义国际秩序观的生成，机会主义国际秩序观引导下日本“一统亚洲”帝国主义国策的确立过程、实施途径和巨大危害，中美苏作为主要战略力量联合抗日局面的形成，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特有的革命性和世界意义。

宋德星，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理论思想、国际战略、中国外交和南亚问题，主要著作有《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大图景》、《印度海洋战略研究》、《恐怖主义如何终结：恐怖活动的衰退与消亡》（译著）、《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译著）等。

东亚传统宗藩秩序的崩塌与日本国际秩序观的生成逻辑

就东亚国际体系而言，传统上中国主导的宗藩体系对于地区安全与发展一度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近代以来，俄国权势的扩张第一次重塑了东亚地缘政治面貌，进而对东亚传统宗藩体系造成严重冲击；明治维新后日本权势的增长和北向扩张，彻底颠覆了中国主导的传统宗藩体系，导致中日之间、俄日之间的敌对与冲突。日本与东亚大陆体系的互动，形塑了其关于国际秩序的基本观念并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主导的传统宗藩体系遭遇首次严重冲击。*在东亚，历史地看，庞大的人口和领土规模、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影响深远的文明成就、具有吸引力的国家治理模式和文化软实力，加之优越的地理条件，造就了中国的体系核心地位。中国封建王朝以自身为中心，将周边的朝鲜、日本和东南亚诸国视作藩属，构建了一套朝贡和宗藩关系。在此背景下，19世纪50年代之前，中国、朝鲜和日本作为三个封建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相对较为简单，主要是中国与朝鲜在漫长封建时代形成并延续的传统宗藩关系，以及隋唐以来试图游离于这种宗藩关系框架之外的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互动。其间，虽发生日本侵略朝鲜、挑战中国主导地位的严重事态，如日本在丰臣秀吉时期曾一度侵略朝鲜挑战中国，但地区总体力量分布保持基本稳定。可以说，在中国封建王朝主导的宗藩体系下，东亚地区总体保持长时期的和平与稳定，国家间关系也相对较为缓和。

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俄罗斯的东进以及日本的崛起，中国封建宗藩体系遭遇严重危机，疆域也被大片蚕食、侵吞。此际，“境况不佳的中华帝国尽管依然主宰着东亚但已然感受到了西方的侵蚀；同时西方的殖民帝国已经在南亚和东南亚成型；19世纪向西方开放门户之后，日本不仅使自己成长为一个现代工业强国，而且试图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自己的帝国”。[3]

19世纪50年代后，东北亚地区形势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在清王朝积贫积弱暴露无遗并日趋衰败之际，俄国作为资本主义大国开始大肆向远东太平洋地区扩张，彻底改变了中国在东北亚地区“一家独大”的局面，开启了资本主义炮舰外交时代东北亚国际关系新时期。中俄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的签订不仅致使中国丧权失地，还标志着一度因《尼布楚条约》而被阻隔在贝加尔湖以西的沙皇俄国，此际已成为东北亚地区强国。其不仅与中国、朝鲜和日本有了共同的边界，还对中、朝、日三国构成了严重威胁。自此以后，中国东北“可称谓半东北，残东北，因其面积缩小了一半有馀，且因为她东边无门户，北边无自然防具——她是残缺的。所以到这种田地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太平天国的内乱；第二是咸丰年间全盘外交政策的荒谬，”“比这两个原因还重要、还基本的是在世界诸民族的竞进中，我族落伍了。有了这个原因，无论有无前两个原因，我们的大东北、全东北是不能保的”。[4]正是在俄国权势扩张和日本崛起的冲击下，中国主导的东亚传统宗藩体系首先在东北亚地区出现动摇。

*日本在东北亚的侵略扩张与东亚传统宗藩体系的崩溃。*在清王朝日益衰落、俄国向远东地区大肆侵略扩张的过程中，日本于1868年开启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明治维新，使其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展为亚洲地区乃至世界性强国，根本上改变了东亚地区的权力结构和国际关系格局。

明治维新是一场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国运的改革，其以富国、强兵、修约为目标，本着“对外政策第一”的原则，对一切妨碍这一目标实现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现状都进行革除改造，甚至包括统治阶层的特权。正因如此，日本的现代化类同于西方历史上旨在增长财富国力

以从事国际权势斗争的重商主义，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富国、强兵、修约的根本之道被确定为学习西方。这一时期，与西方大国在平等基础上签订新的条约被视为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这不仅决定了日本外交政策的方向，还对其国内政治产生深刻影响。明治政府急切地向西方国家证明：日本已经西化、“文明化”，除了肤色之外，日本已经是“西方的一员”。恰如有学者指出：“现代日本国家很大程度上发端于其应对外部秩序的挑战。它的生成是基于对外部秩序的机会主义反应，而不是自发地、自然地从国内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旦外部秩序发生变化，日本也将相应调整其政策和内部组织结构，以适应变化了的秩序。结果在日本整个近代史中，明治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外交政策动能决定了日本的道路选择。”[5]明治时期，与工业化进程齐头并进的是日本创建并迅速扩充西方式的常备军，军事力量日渐增强、权势急剧勃兴的日本，很快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1875年9月，日本派军舰侵占朝鲜的永宗岛，次年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1882年又通过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济物浦条约》，攫取了在朝鲜的驻兵权，首次实现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的军事扩展理论，[6]表明日本全力向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扩张的决心，同时也意味着其开始将俄国作为地区竞争对手。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王朝战败，日本将所谓“主权线”延伸至中国领土台湾岛和澎湖列岛。可以说，中日甲午战争是一个分水岭：东亚地区新的力量格局开始出现，这意味着，一方面，中国数千年来在东亚地区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及其主导下的传统宗藩体系走向终结，东亚国际关系进入以日本为主导的新时期，尽管其还未能取得历史上中国那样的强势地位；另一方面，日本作为新崛起大国必将深刻作用于国际体系，即对东亚国际关系甚至东西方关系产生巨大影响。正如有学者指出，此际的日本作为第一个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y），其快速的经济增长、政治转型和权势扩张，昭示着其潜在的全球影响力不容忽视。[7]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通过军事胜利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南库页岛及其附近岛屿，并获得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南满”）的控制权；1910年日本通过《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其所谓的“主权线”延伸到东亚大陆。这样，日本对华侵略扩张不仅有了稳固的陆上前进基地，而且有了战略上的所谓“理由”——为了维护日本的既得利益就必须征服中国。自此，中国成为日本权势扩张的首要作用对象，由此引发东亚太平洋地区局势大震荡和新一轮大国战略角逐，其中日俄较量和日美矛盾尤为突出。

日本与东亚大陆体系的互动样式及其国际秩序观的内生逻辑。[8]从地理区位上看，日本与东亚大陆隔海相望，造就了中日之间若即若离的地缘政治关系。历史上，日本对东亚大陆体系蕴含的机遇和压力的感知与战略把握，并不完全取决于其自身，而是深受古代中国对周边国家经略的辐射影响。至少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总体而言是东亚地缘政治作用的对象，而非主导者。故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日本一方面周旋于中国主导的东亚大陆体系中，努力寻求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积蓄力量，力图脱离该体系的规制，甚至图谋取代中国成为东亚大陆体系的主导者。近代之前，日本总体上缺乏从根本上动摇东亚大陆体系的能力，接受或默认中国主导的秩序便成为日本政界的一项政策共识。

进入近代后，同中国清政府一样，日本幕府的稳固政治统治开始被美欧列强的坚船利炮和权力政治法则所动摇，在被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国家面临着沦为殖民地的巨大危险。鉴于此，明治天皇在推翻幕府统治后自上而下推行维新改革，开启了日本快速崛起的进程，并产生两方面战略效应：

一方面，在处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特别是废止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日本开启了特色鲜明的“欧洲化”进程。有学者指出：“明治政府贪婪地同时也是便捷地引进西方的技术，如战船、火炮、机器、法律和‘现实政治’（Realpolitik），同时保留了日本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9]即通称的“脱亚入欧”。1902年英日签署同盟条约，不仅标志着日本的大国地位获得了欧洲列强的承认，还表明欧洲首强国家在远东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日本的加持。

另一方面，在明治后期国家经历快速重建和工业化之后，日本在20世纪初发展成为一个更发达、现代化且野心勃勃的国家。[10]日本也因此像西方列强一样，开始在东亚实行对外扩张战略并持续发起争霸战争。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击败清政府，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日本开始取代中国成为东亚强国，中日关系史上首次出现总体上有利于日本的强弱转换格局。1905年日本在对马海战中战胜俄国，赢得日俄战争，这是近代以来亚洲国家对西方强国的首次胜利，由此奠定了日本在远东大陆体系中的首强国家地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加入协约国集团对德奥同盟作战，并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获得了德国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中国再度成为日本侵害的对象。在1894～1914年的20年间，日本先后与中国、沙皇俄国和威廉德国开战，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并最终成为东亚体系的主导性大国之一。

有学者指出：“对日本来说，军事成功极大地提升了日本军方的声望，这一事实在20世纪30年代给日本国内带来可怕的政治后果。日本的军事胜利既证明其现代化的成功，也证明东京具备了对主要对手发动短期战争的能力。”[11]作为传统东亚大陆体系的破坏者，日本尽管无法单独主导该体系，但其上述军事冒险行动取得的成功无疑极大地助长了日本的帝国主义野心。这使日本不仅渴望构建一个有助于实行帝国统治的所谓“大东亚秩序”，而且在军事冒险道路上越走越远，因而其与美国迎头相撞和战略对决也就不可避免。

在日本大肆扩张的同时，美国同样快速崛起，并着眼于重塑一战后的国际秩序，积极寻求在华“门户开放”和扩张远东利益。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成功构建以美日在东亚太平洋地区战略均势为核心、自我约束和条约体系约束相结合的华盛顿体系以及远东太平洋地区秩序，以规制日本扩张势头。[12]为颠覆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体系和地区秩序的规制，日本再度走上军事对抗的道路。以1931年发动侵华战争、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为标志，日本成为远东地区的战争策源地。至此，华盛顿体系彻底崩溃，日本进入可以放手进行侵略的所谓“无条约时代”，[13]其军事法西斯的战争狂热性和巨大危害性随之暴露无遗。被其所迫，中美苏联合抗日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从长时段历史来看，日本与东亚大陆体系的互动，造就了其关于国际秩序的基本观念并一直延续至今，即要么遵从体系核心国家制定的制度规范和国际秩序，以便在权势等级结构中赢得安全与互惠安排；要么凭借自身的权势颠覆体系核心国家的领导地位，进而掌控东亚大陆体系。[14]为达此目的，日本甚至不顾后果发动侵略战争，这是一种典型的追逐强权的机会主义举动。[15]

日本侵略性帝国主义国策的确立与“大东亚秩序”野心

明治维新后，日本作为崛起大国在颠覆中国主导的传统宗藩体系的同时，也在追逐强权的机会主义引领下逐渐确立建立一个“亚洲帝国”的基本国策，其目的不仅在于谋求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而且致力于使日本一流大国身份得到认可。为此，日本妄图通过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手段，构建有利于日本帝国统治的“大东亚秩

序”，以实现“一统亚洲”的狂悖梦想。[16]

从谋求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到渴求建立亚洲帝国。历史上，日本在与东亚大陆体系互动时，已暴露出其谋求与中国平起平坐的野心。及至近代，日本与中国一样被迫进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对于日本而言，1853年“佩里叩关”及次年签署《日美亲善条约》，可谓影响深远。正如阿尔伯特·克雷格（Albert M. Craig）所说：“在日本看来，西方强国在自家门口的存在是不可容忍的……为此，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的国家，以对付他们非常清楚的外国势力……此际封建时期的价值观还继续发挥作用，几乎没有变化，这解释了日本为何如此痴迷于与西方平起平坐。”[17]结果是，“想要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并超越他们的野心，我们姑且称之为‘追赶动力’，在日本加入国际体系之初就成为日本领导人的执念”。[18]

出于这样的执念，日本在推翻幕府统治后大力推行维新变革。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1875年日本与俄国签署《库页岛千岛群岛互换条约》，这是日本第一次与西方大国签署平等条约；1894年日本与英国就修改不平等条约达成协议，随后又与其他西方国家进行修约，从而摆脱了外交上的不平等地位；1902年，日本与西方首要强国英国结成同盟，以世界强国的身份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从而改变了东亚太平洋地区的权势格局。

正如相关研究指出，日本幕府被迫向西方开放，催生了日本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战略文化剧变，为日本帝国主义在该地区的兴起和衰落播下了种子。这一战略文化既热衷于对国际威望、先进技术和军事实力的现代阐释与渴求，又深深根植于此前的武士道价值观之上。[19]换言之，此际日本战略文化的迭代演变，是在一个对天皇无上忠诚的社会中完成的，天皇作为首脑被视若“神明”，其使命是“八紘一宇”，建立自己的帝国。于是，权势扩张、特别是海外军事扩张自然成为其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

实际上，“明治时期的决策者认识到，建立帝国是西方国家现代性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帝国是所有列强共享的特征，如果日本希望加入他们的行列，那么这一岛国也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帝国。”[21]因此，山县有朋、松方正义、福泽谕吉和德富苏峰等一批重要人物大肆鼓吹并共同形成了赞成帝国主义行为的思想，并致使从日本政府到民间都达成这样的共识：“日本必须果断行动，甚至必须牺牲他国，假如日本不想被牺牲的话。”[22]更有甚者，1906年出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的田中义一鼓吹：“我们必须摆脱岛国的局限性，成为一个拥有大陆的国家。”[23]

可见，对于日本领导人而言，“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恢复被不平等条约侵犯的国家主权，不仅仅是保护日本的领土免受帝国主义侵占的危险，甚至不仅仅是建立帝国。获得权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给日本带来尊严和作为一流国家的认可。”[24]显然，明治政府在规划帝国图景的过程中，前现代力量和现代力量相互纠结，为日本向大陆扩张并建立“大东亚秩序”提供了动力。

日本“一统亚洲”侵略性国策的确立与“大东亚秩序”主张。对于明治时代的日本来说，弱肉强食是世界的唯一准则，为避免被西方列强殖民，日本需要迅速使自己强大起来，同时准备吞并弱小的邻国。日本资深外交官内田康哉（Uchida Yasuya）在1891年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指出，就东亚而言，中国和朝鲜作为落后的“文明”，必将沦为贪婪的西方的“成熟果实”。不仅如此，在侵略中国和朝鲜之后，西方随后将威胁日本的独立。为了防止这种威胁，内田建议日本有必要将中国和朝鲜“联合起来”，置于日本的领导之下。他认为，一个统一的亚洲是避免西方统治的唯一途径。[25]

显然，“一统亚洲”有赖于日本逐步实现其所谓亚洲政治上的一统、经济上的一统和文化上的一统。这方面，日本面临的战略阻力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一战后反对殖民统治、强调民族

独立、主张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反帝爱国意识普遍高涨；二是面对日本的侵略扩张，中国追求主权独立和民族解放的神圣事业具有坚实的国内基础和强大的内生动力；三是美国严重担忧日本独霸东亚进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这迫使其放弃孤立主义转而采取对日遏压举措。其中，中国的抗战和美国作为体系强国的对日态度无疑具有头等意义。对于日本侵略者而言，需要在战略上统筹考量对华对美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就是从全球战略出发，为未来的日美战争做准备”。[26]对此，“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在1929年7月拟制的《作为扭转国家命运之根本国策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中指出：“若准备对美作战，就要立即（对华）开战，断然把满蒙政权握于我手中。”[27]

如前所述，在日本的国际秩序观中，机会主义是一大特质，即一旦有机会，便急切、不遗余力地动用武力颠覆原有的国际秩序，以期实现战略突破。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基本国策不仅着眼于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而且意图在亚洲建立一个排他性的大帝国，以实现权力独享。这就要求日本必须推翻现有国际秩序对其施加的规制，构建一个日本主导的“大东亚秩序”。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了对华军事侵略政策，这表明日本已经放弃华盛顿会议后币原外交以经济侵略为主的缓进政策，代之以战争攫取“满蒙”的武力侵华急进政策。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满现状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个重大侵略行动；[28]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狂悖声明称：日本对于维护东亚的和平与秩序负有特殊的责任，这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对中国进行新的侵略的公开信号；[29]1936年2月26日爆发的“二二六”事件标志着以军部为核心的天皇制法西斯专政的建立，为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作好了准备；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也宣告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30]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欧洲大国法国在德国闪电战进攻下投降，英国被孤立。对于日本而言，这似乎是一个合适的时机，促使其决定将“大东亚秩序”由中国扩展至东南亚。日本认为，英国和法国分别通过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对华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支撑了中国的抗日。如果英国被迫投降，这种援助就会停止，日本也就有了胜算。[31]故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日本的战略目标不是结束侵华战争，而是要充分利用此际德国“闪电战”赢得欧洲战争胜利的有利时机，扩大其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32]

通过长期的对外侵略扩张，日本先后侵占了中国台湾（1895），吞并了朝鲜（1910），发动侵华战争占领中国大片领土（1931～1945），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1932），成功偷袭美国的珍珠港（1941），在东南亚控制了缅甸、柬埔寨、老挝和马来亚，在苏门答腊、爪哇和东印度尼西亚建立分裂政权肢解荷属东印度群岛（1941～1942），一个日本统治下的庞大的亚洲—太平洋帝国产生了。显然，日本“一统亚洲”的侵略性国策不可避免地将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奋力反抗，且要与苏联和美国两大对冲性力量迎头相撞，一场更大规模的抗日战争不可避免。

日本“大东亚秩序”野心的主要策略手段。对于日本来说，地理和文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及其衍生的地缘观念、权势思想和赌徒心理，促使其总是在历史关键时期急切地参与国际权势大争斗，[33]其政策轨迹正是以地缘为导向，对周边进行觊觎、掠夺、侵占直至战败退缩。明治维新后，日本不仅认为自己是亚洲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样板，而且视自己为亚洲的“天定领导者”。为实现“一统亚洲”的侵略目的，日本主要运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手段，以建立其主导的“大东亚秩序”。政治上，日本统治者充分利用其所谓“现代化样板身份”推进侵略扩张的目

的。明治维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激进的国家政策变化之一”[34]，“代表了第一个掌握现代技术的非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因此成为许多非西方边缘社会的榜样”。[35]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伪“满洲国”，并图谋在中国华北地区建立所谓新的政治秩序，就是典型表现。[36]

在进行野蛮军事侵略的同时，日本也通过多种外交途径为其军事行动背书。20世纪30年代初，在日本外务省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所谓泛亚改革派（pan-Asian reformists）。“这个派系的主要目标是在东亚建立新秩序，一个日本领导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集团。他们对现有国际秩序持蔑视、不信任和敌视的态度；尽管如此，他们仍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建立新秩序，并避免与英美列强发生直接冲突。”[37]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日本的帝国野心再度膨胀。1934年2月2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Hirota Kōki）在国会表示，日本将承担建立新的地区秩序的责任。他称：“日本作为东亚和平大厦的唯一基石，承担着地区秩序重塑的全部重任。”[38]这样，通过武力构建所谓“大东亚秩序”便成为基本政策选择。

除了政治、军事和外交手段外，日本还不遗余力地推行文化殖民，厚颜无耻地认为：“大东亚秩序”的建立，“只有在文化活动与政治和经济活动并行不悖的情况下才能完全实现。日本必须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领导者，同时必须成为新的大东亚文化的建设者”。[39]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其国内媒体公开支持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对此，路易斯·扬（Louise Young）解释道：如果说日本媒体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以经济和外交手段维护日本利益的做法还有可能的话，“在1931年，他们认为有必要在‘满洲’展示武力。简而言之，日本媒体致力于团结那些支持军事占领的公众舆论，因为他们确信军队是正确的”。[40]为美化侵略，日本哲学家北田西田（Nishida Kitarō）于1943年将日本的侵略战争描述为一场解放和统一亚洲的所谓神圣的泛亚斗争：“大东亚战争是一场神圣的战争，因为它是亚洲历史进步的顶点……被解放的人民现在的任务是赢得战争，并与德国、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民合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些国家正在为欧洲新秩序而进行英勇斗争。”[41]显然，混杂着政治野心、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外交欺诈和文化殖民等手段，大肆对外侵略扩张的日本，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必将遭到：一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遭受其侵略的广大亚洲国家的奋起抵抗；二是与日本历史宿怨深重、渴望从日本手中夺回自己历史特权的苏联的反击；三是反对日本独霸野心、致力于维护华盛顿体系的美国的打压。一场文明与野蛮的对决不可避免，其最终结果是日本军事法西斯主义的覆灭、“大东亚秩序”的破产和日本的战败投降并被改造。对此，美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肯尼思·派尔（Kenneth B. Pyle）指出：“长期以来，这个国家一直被追赶并超越其他世界大国这一明确的国家目标所驱动，这一目标看似已经触手可及，最终却出了偏差，乃至迷失了方向。”[42]

1931～1945年苏美对日战略考量与中美苏联合抗日局面的形成

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与德意日法西斯集团的较量中，日本军国主义以其野蛮、残酷、血腥和破坏性著称。显然，要战胜这样的残暴之敌，需要反法西斯国家付出长期艰苦不懈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需要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稳固。其中，作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要战略力量，中国、美国和苏联一致联合抗日尤为重要。尽管出于各自不同的战略考量，苏联和美国在抗日政策调整方面一度出现波折，但最终都汇集到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大旗下，与中国一道为战胜日本法西斯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苏联对日政策基本考量与抗日立场的转变。20世纪初，美国、俄国和日本成为在远东地区有直接利害冲突且发挥主要影响力的国家，而欧洲列强逐渐被排挤出去。虽然1902年英国与日本结盟，但英国未能控制日本，反而日本成功利用英日同盟增进了自己的权势和利益。鉴于此，作为远东太平洋地区强国的美国、俄国和日本，在观察和处理东亚事务时，其着眼点不再是欧洲均势，而是远东的力量态势或西太平洋地区的均势。更确切地说，日本在该地区建立霸权所产生的威胁，成为决定大国关系和地区秩序的重要因素。[43]

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使俄国重新回到欧洲。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在1907年指出："我们必须把我们在亚洲的利益置于一个适当的基点上，否则我们就会仅仅成为一个亚洲国家，而这对俄国来说将是最大的灾难。"[44]日俄战争后，俄国也深感日本的威胁，认识到日本若以旅顺军港、"南满"和朝鲜为前进基地，可以成功切断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从而使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陷于孤立境地。在俄国看来，那时日本就可以夺取俄国整个海滨省，使俄国势力重新退回贝加尔湖以西地区。[45]这无疑将使俄国处于十分不利的地缘战略地位。尽管如此，日俄战争后俄国的战略重心显然不在远东而在欧洲，即以增强西线防御实力、全力对抗德奥集团为战略重点，在远东对日本则实行缓和政策，以尽可能迟滞来自日本的威胁。

1917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宣告成立，随即面临着英法主导的凡尔赛体系的孤立和遏制；20世纪30年代，随着德意法西斯侵略扩张步伐的加快，加强工业和国防建设、防止希特勒德国的侵略和英法祸水东引，成为苏联基本国策的重中之重。为重新夺回远东地缘战略优势和历史权益，苏日之间新的一轮战争将不可避免，这对苏联来说只是时机选择问题。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为一个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苏联对日战略思考始终瞄定避免自身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不利形势，且首要战略关切是欧洲事态的发展及其对苏影响。为此，苏联希望通过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来拖住日本侵略军，避免与日本过早摊牌，这是一种典型的间接路线选择。据此，苏联与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给予中国抗战以较大的经济、军事和作战人力方面的支援，[46]在苏联远东地区加强军备。在1940年前美英还无意真正抵抗日本侵略、采取利己主义两面政策、对华支援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苏联作为一个大国给予的支持和援助对于中国抗战而言无疑意义重大。

苏联把避免东西两线作战作为对日政策的基点，这决定了其对日宣战的时间受欧洲战场形势的影响。换言之，在加大对华援助的同时，对日实行中立、缓和与修好政策，[47]成为苏联间接路线选择的核心，因而也是一个漫长而充满矛盾的对日政策转变过程。对于苏联而言，只有在欧洲战场上打败希特勒德国已成定局，同时苏联在远东的特权要求得到美国认可，其对日政策才可能发生根本性转变，即放弃固有的在中日之间周旋的两手政策，转而与中、美两国一道对日作战。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次日对日军发起战略进攻，就是上述路线的鲜明体现。

美国对日政策基调从消极"中立"走向全面抗战。与日本的崛起几乎同步，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以远超日本的规模和速度实现崛起。1898年在美西战争中击败西班牙之后，美国吞并菲律宾和关岛，并迅速向西太平洋和东亚地区扩张自己的权势和影响，[48]加之欧洲列强在东亚地区既有的势力范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日本进一步扩张的空间。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取得胜利之前，美国在亚洲没有任何前沿部署，也极少在该地区使用武力。美西战争后，美国信心和实力的增长及其在东亚地区前进部署态势，开始在其与东亚地区国家的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标志性事件是美国于1921年主导了旨在构建远东太平洋地区国际秩序的华盛顿会议，通过《四国条约》

《五国海军条约》《九国公约》，确立了美日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均势，以及对日条约规制体系。

美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实力与活动的增加，必将催生其与寻求扩张的日本之间的直接竞争。结果是日本对于被美国势力赶出该地区的担忧导致其国内民族主义的上扬，也强化了其在中国问题上与美国对抗的意愿。[49]为摆脱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的束缚，日本开始采取颠覆华盛顿体系的行动，相关的重大事态包括1931年发动侵华战争并占领中国东北地区，1936年日本公开放弃《五国海军条约》规定的海军主力舰吨位比限制，以及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等。之后，随着军国主义者接管日本政治权力，其对外行动变得愈加极端，决心推翻美国对其扩张施加的所有限制，日美之间的战争也不可避免。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海军基地，成为两国关系的转折点。

对于美国而言，1931年之后的日本显然是其主导的远东太平洋地区秩序的最大挑战者，对日制裁乃至军事打压理应成为美国对日政策的主基调。但1931～1940年，美国的对日政策深受国内孤立主义思想的影响，其对远东太平洋局势的核心关切很长时间里未能超越商业利益这一传统议题，且主要凭借外交宣示和舆论引导来维护商业利益，即坚持一种符合孤立主义取向的低级政治领域战略运筹模式。在中日之间，美国政府既想维系美日商贸联系，又想维护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当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暴露出独占中国的野心时，美国尽管对日本这一行径十分不满，却不愿对日制裁，更不会军事干预。

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署，促使美国领导者重新评估对日政策，并开始认识到亚洲和欧洲的冲突是相互联系的，意识到这两个地区面临敌对霸权的幽灵，[50]这催生了美国摆脱孤立主义的冲动。同时，美国重申1921年建立的远东太平洋地区秩序对于其安全利益的至关重要性。据此，在1940年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和日本驻美大使野村之间的谈判中，赫尔明确表示美国不准备接受日本的秩序，甚至不准备向现状妥协。相反，他告诉野村，必须恢复华盛顿体系的基本原则：尊重所有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支持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支持平等，包括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不变更太平洋地区的现状，除非用和平手段改变这一现状。[51]对于赫尔照会，日本外务大臣称：“（美国）完全无视日本多年所作的牺牲，迫使我们放弃我们努力在远东建立的大国地位。照此去做，对日本来说只能意味着自杀。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起身应战。”[52]

1940年美日外交谈判的失败和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预示着美国对日政策从绥靖走向强硬，从消极“中立”走向全面抗日。此后，美国对于战争、战略、国际秩序这类高级政治议题的关注，压倒商业利益这类低级政治议题，对日决战决胜成为美国政策的主基调。即便如此，美国对日军事行动的展开依然为盟军“先欧后亚”战略所框定，其全球战略布局决定了对日战争必须服务于欧洲战略安排。这意味着美国尽管已与中国并肩作战，但中国仍需继续承担对日作战的主要责任，以策应美国的战略需要。

*主要战略力量联合抗日局面的形成。*在日本的侵略扩张过程中，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日俄战争（1904～1905年）、日本侵华战争（1931～1945年）和太平洋战争（1941～1945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一系列的侵略战争，日本不仅给东亚邻国带来巨大灾难，也对西方列强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权益形成了挑战。日本权势扩张的历程表明：依据“主权线”和“利益线”侵略理论进行的权势扩张，使日本在东北亚乃至东亚地缘政治中占据了相当长时间的战略优势：1894年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清王朝、1910年吞并朝鲜、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之后，中日两国隔海相望变成陆上邻国；通过一系列侵略战争独占中国东北地区、吞并朝鲜、夺取南库页岛后，日本与俄国不仅隔海相望，还在朝鲜半岛和库页

岛上为邻；一战后通过占领德国在西太平洋上的岛屿属地以及1941年实施“南进”政策，日本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形成了直接军事对峙态势。

在日本侵略扩张进程中，中国既是其加害的对象，又是其焦虑的问题。这主要缘于中国国家大一统的强大内生动力，部分得益于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民族自决主张和《九国公约》对于维护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强调。1926～1928年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通过北伐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国家统一，使得日本面临着一种可能，即此前日本两代人在中国大陆取得的侵略权益和特权地位，面临着被迫撤销的可能。[53]为维护侵略权益，1931年日本策划“九一八”事变从此走上侵华战争的道路。这样，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成为抵御日本侵略扩张的第一道屏障。

1941年底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同时把侵略魔爪伸向英、法、荷等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与美国在西太平洋拉开了战争序幕。这样，在中国已进行了长达10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之后，美国于1941年底对日宣战，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抵御日本侵略扩张的又一道重要屏障。在抗击日本侵略的过程中，美国认识到日本人是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和扩张主义者。[54]为掌握主动权，美国认真投入对日作战之中，最终在1945年实现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并展开对日本的美式民主化改造。

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美国与苏联达成了含有侵害中国主权权益内容的关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协议。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次日出动150万兵力打击日本关东军。在中国抗战14年之后，苏联最终加入对日作战，成为促使日本投降的又一主力军。同时，借助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有利时机，苏联再次改写了东北亚地缘政治版图，战后与美国在朝鲜半岛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划分了势力范围。

1931年至1945年，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扩张，首先指向中国，其次指向地区战略对手苏联，再次指向在东南亚拥有殖民地的英法荷和对日本侵略扩张持“不承认主义”立场的美国。就抗击日本侵略扩张而言，在中美苏三大战略力量中，中国不仅遭受了最严重的侵害和承担了最大的压力，而且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和贡献。1931～1941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主要是孤军奋战，但美国和苏联出于各自的战略考量在不同程度上给予了中国外交、道义和国际舆论支持，以及经济或军事援助。这也促使不承认日本侵略扩张的占领、同情并支持中国人民抗战、反对日本军事法西斯主义成为国际社会一大共识。特别是自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英美站在反对日本方面，成为中国抗战的同盟军”；[55]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宣战，中美在政治、军事、外交上紧密配合，成为反法西斯联盟中联合抗日的主力军；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投身反法西斯战争，并于1945年8月加入联合抗日阵线，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

应当指出的是，主要战略力量联合抗日不仅体现在军事行动上，还体现在外交一致上。1943年10月30日，中、美、苏、英四国外长在莫斯科发表《普遍安全宣言》，强调四国将遵守1942年1月1日的《联合国家宣言》，采取联合行动，继续与轴心国作战，“直至这些轴心国根据无条件投降而放下了武器为止”；[56]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签署《开罗宣言》强调，“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57]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强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58]

这样，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大旗下，中

美苏作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三大战略力量正式联合，为打败日本军国主义、推翻日本法西斯专政作出了巨大牺牲和伟大贡献。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革命性与世界意义

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毛泽东同志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59]正是世界性的抗战这个主题，使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革命性和世界意义不言自明。

伟大的中国抗战是“中国的事”。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迈出侵略中国的第一步。是年，日本关东军侵吞中国东北三省，将中国东北地区改造成进一步扩大侵略的战略基地。此后，日本的侵略魔爪从中国东北伸到长城以南。1937年，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试图从根本上否定中国人民独立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对此，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强调“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60]中国共产党也向全国发出号召抗战的宣言，强调“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61]

自此，“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统治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在卢沟桥事变后开始转变为实行抗战的政策；[62]国共两党也由内战走向联合抗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两种战争形态全面展开。[63]最终，中国人民以3500万军民伤亡的惨烈代价和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64]坚守住了东方主战场，不仅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赢得战略主动权和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伟大的中国抗战是“世界的事”。自1937年以来，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使得日本陆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日方不得不在“中国事变”[65]未解决的情况下，尽量采取不与第三国开战的方针。对此，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5年在美国国会所作的国情咨文中强调：美国“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66]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首相丘吉尔指出：“现在，不但英帝国，而且美国也在为生存而战斗；俄国在为生存而战斗，中国在为生存而战斗……一切精神和希望都寄托在这四个伟大的作战团体的身上。”[67]也就是说，对日作战在辽阔的亚洲—太平洋战线全面展开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特有的世界意义更为彰显，并为反法西斯主要战略力量所倚重。为了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强调“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68]

中国抗战作为“世界的事”，还体现在成立盟军中国战区（Chinese Theater）、中缅印战区（United States Army Forces, China-Burma-India Theater）和东南亚战区（Southeast Asia Theater）上。[69]为采取联合行动，中国在坚持本土抗战的同时，还组织中国远征军赴印缅抗战，从1942年初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入缅援英，到1945年初中国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反攻作战取得胜利，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中国先后出动40万大军，前往以缅甸为中心、滇西和印缅边境为两翼的东南亚战场上与美、英盟军协同作战，[70]为保卫缅甸、援救盟军、协防印度、反击日寇立下了汗马功劳。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到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将起决定性的作用。”[71]

结语

“在整个日本现代史中，日本外交上一个主要的、多次重复的特点是随着国际秩序的主流而见风使舵，以加强日本的国力。”[72]这在日本亚洲侵略史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正是这种追逐强权的机会主义，使得日本在侵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31年至1945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既是明治以来日本侵略性帝国主义国策的延续，也是其应对外部环境和国际秩序变化、谋求“一统亚洲”帝国野心膨胀的结果。故从国际秩序和世界历史视角分析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内在动能，揭示中美苏作为主要战略力量走向联合抗日的历史逻辑，进而认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革命性和世界意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9月3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0-09/03/content_5540181.htm。

[2][30][60][61][62][63][6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75、352、344～345、343、352、404～437、67页。

[3]L. Narangoa, R. Cribb, (eds.), *Imperial Japan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Asia, 1895-194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Introduction, p. 1.

[4]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长沙：岳麓书店，1999年，第179页。

[5][18][24][42][50][53]K. B. Pyle, *Japan Rising: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7, pp. 9, 115-116, 115, 6-7, 238, 201.

[6]山县有朋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的军事扩展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何为‘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也。何谓‘利益线’？即与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应该看到，在这一扩张理论中，日本的“主权线”始终在向外扩张，相应地，其所谓的“利益线”也不断地随之扩大。见（日本）近代研究会：《近代日本人物政治史》（上），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1955年，第174页。转引自黄定天著：《东北亚国际关系史》，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64页。

[7]S. C. M. Pain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Perceptions, Power and Prim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

[8]这部分内容参见宋德星：《“多重秩序世界”中日本的基本战略选择》，《日本学刊》，2024年第1期。

[9]H. Matsuzawa, "The Rise and Fall of Bunmei-ron (Theories of Civilization)," unpublished MS. Papers Given at the Japan Foundation Seminar at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November 1978, quote from C. Holmes, A. H. Ion, "Bushidō and the Samurai: Images in British Public Opinion, 1894-1914," *Modern Asian Studies*, 14(2), 1980.

[10]G. Hubbard and T. Kane, *Balance: The Economics of Great Powers from Ancient Rome to Modern Americ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3, p. 165.

[11]J. Curtis Perry, "Asia's Telectronic Highway," *Foreign Politics*, No. 59, Summer 1985, p. 49.

[12]有关华盛顿体系及其运作机制的论述见时殷弘：《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20世纪回顾》，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61页。

[13][26][28][47]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五卷（1929-193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88、68、64、219～220页。

[14]宋德星：《“多重秩序世界”中日本的基本战略选择》，《日本学刊》，2024年第1期。

[15]肯尼思·B·派尔：《日本：一味追求强权的机会主义》，载罗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6]1882年福泽谕吉曾鼓吹：“总有一天，我们日本会强大起来，不但要像今天的英国那样把中国和印度握在掌心，还要打退英国，自己来统治全亚洲。”转引自肯尼思·B·派尔：《日本：一味追求强权的机会主义》，载帕斯特编：《世纪之旅》，第271页。

[17]A. M. Craig, *Chōshū in the Meiji Restor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373-374.

[19][20]A. L. Oros, "Japan's Strategic Culture: Security Identity in a Fourth Modern Incarnation?"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35(2), 2014.

[21]布雷特·L. 沃克：《日本史：前14500年至今》，贺平、魏灵学译，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第205页。

[22]詹姆斯·L. 麦克莱恩：《日本史：1600-2000》，王翔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4年，第280页。

[23]转引自D. C. Evans and M. R. Peattie, *Kaigun: Strategy, Tactics, and Technology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887-1941,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p. 148.

[25]Uchida Yasuya Denki Hensan Iinkai, (ed.), Uchida Yasuya (Tokyo, 1968), p. 14. 转引自Rustin Gates, "Solving the 'Manchurian Problem': Uchida Yasuya and Japanese Foreign Affairs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Diplomacy & Statecraft*, 23(1), 2012.

[27]日本国际政治学汇编：《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第2卷，朝日新闻社，1962年，第367页。转引自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五卷（1929-193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第68页。

[29]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原书房，1978年，第284页。转引自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五卷（1929-1939），第84页。

[31][32][37]M. Kimura and T. Minohara, (eds.), *Tumutuous Decade: Empier, Soiety, and Diplomacy in 1930s Japa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3, pp. 220, 219, 216.

[33]宋德星、殷实：《地缘属性、文化特质与日本的大战略缔造——一项侧重于地理与文化维度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8期。

[34]J. Keegan,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Penguin, 1989, p. 241.

[35]M. Mandelbaum, *The Ideas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Peace, Democracy, and Free Marke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2, p. 80.

[36]Narangoa and Cribb, (eds.), *Imperial Japan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Asia*, 1895-1945, p. 8.

[38]转引自J. B. Crowley, Japan's Quest for Autonomy: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1930-193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196.

[39]Ryuichi Kaji, *Japan: Ein Kulturuberblick*, Tokyo: Kokusai Bunka Shinkokai, 1939, p. 49.

[40]L.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 82.

[41]S. Saaler and C. W. A. Szpilman, "Pan-Asianism as an Ideal of Asian Identity and Solidarity, 1850–Present," 25 April 2011, p. 27, http://japanfocus.org/-Sven-Saaler/3519.

[43][4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张宇宏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76、78页。

[45]W. C. Fuller, Jr., *Strategy and Power in Russia, 1600-1914*,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8, pp. 372-373.

[46]有关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具体情况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五卷（1929-1939），第200～202页。

[48]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强调太平洋时代将超过大西洋时代，表达了美国对外事务中需要重点关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第50～51页。

[49]M. H. Hunt and S. I. Levine, *Arc of Empire: America's Wars in Asia from the Philippines to Vietnam*,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4,

pp. 60-61.

[51]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衰亡》，郭伟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年，第88页。

[52]T. Shigenori, *Tōgō Shigenori gaikō shuki: jidai no ichimen/Tōgō Shigenori cho*, vol. 1 (Tokyo: Hara-shobo, 1985), pp. 251, 253. 转引自Kimura and Minohara, (eds.), Tumutuous Decade, p. 258.

[54]关于日本文化民族主义的论述见鲁思·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吕万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戴季陶著：《日本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

[55]周恩来：《论统一战线》，《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8页。

[56]《中苏美英四国普遍安全宣言》，《对日和约问题史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

[57]《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对日和约问题史料》，第7页。

[58]《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宣言》，《对日和约问题史料》，第9页。

[59][6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伟大贡献：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年，第65、39页。

[65]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本将其发动的侵华战争称为“中国事变”。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两日后，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这次对美英的战争，以及今后随着形势的演变而出现的战争，也包括中国事变，称为大东亚战争”。可参见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册），田琪之、齐福霖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9页。

[66]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罗斯福选集》，关在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80页。

[67]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3卷（下）第3分册，吴万沈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939页。

[69]盟军中国战区属于盟国军事合作的一种机制，其于1942年1月成立；美军中缅印战区属于美国陆军建制，其于1942年3月成立，总部初建于重庆；盟军东南亚战区属于盟国军事合作的一种机制，其于1943年8月成立。参见张毅：《中英美关于盟军中国战区统辖范围的交涉（1942-1945）》，《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2期，第113页。

[70]徐康明：《中国远征军战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6页。

[7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3页。

[72]肯尼思·B·派尔：《日本：一味追求强权的机会主义》，载帕斯特编《世纪之旅》，第302～303页。

责编/包钰 美编/梁丽琛

1931–1945: The Joint Anti-Japanese Aggression Efforts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lapse of Japan's "Greater East Asia Order"

Song Dexing

Abstrac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Japan and the East Asian mainland system and Japan's opportunistic international order perspective of pursuing power shaped the basic concepts and external behaviors of its international order. This was also an important internal cause for Japan's aggressive actions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as a truly whole-nation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a joint operation of the world anti-fascist alliance with great responsibility. It had revolutionary and global significance.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as not only a life-and-death struggle between aggression and resistance, but also a struggle between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 It needs to be examined and underst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process of world history.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made by the major strategic powers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jointly resisting Japanese aggression be powerfully demonstrated, which was crucial to the victory of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Moreover, it can also highlight the great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Keywords: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orld Anti-Fasci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Japan's "Greater East Asia Order"